

反击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

——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¹

J. 沃纳

在首次审阅霍查的新书《帝国主义与革命》时，有同志说它是一个卑鄙、无耻和恶毒的把戏。请读者们查阅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作品清楚表明，霍查的新书中大多数针对毛的指控都是对此最严重的明目张胆的误述、歪曲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同时也请读者阅读一下苏联对毛的许多批评，这些批评与霍查的有着相同的方法和大多数相同的论据，这些批评至少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呈现修正主义路线。

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使得毛的路线不可能被继续遵循，无论它的前景多么诱人。以华国锋和邓小平为首的资本主义领导者夺取了革命中国的政权，导致一些前马列主义者投降，还有更多的人士气低落。国际运动的目光集中在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PLA)身上，希望在共产主义者们被迷惑和混乱包围时，阿劳动党继续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政变的最初反应尽管充满了折中主义和矛盾的论断，但它依然被寄予厚望。

然而霍查和阿劳动党的领导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把党的威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查与毛依靠当时被世界各地的修正主义者攻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结在一起而获得的）借给了那些放弃进步的、在过去二十年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伪装起来的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修正主义者们在对革命家的错误进行

1. 本文来自《共产党人》（美革共），1979年5月，第五期。

神化和极端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一切都是在马列主义的“纯洁”之名下进行的。

当然，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修正主义把自己定位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异端”甚至是狂信徒的笔触来描绘真正的革命共产党人。卡尔·考茨基在他那时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托洛茨基也摆出“无产阶级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机关算尽地去削弱和破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恩维尔·霍查作品描绘的前景相反，世界并不会以一条平顺的直线前进。关于世界的这条真理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毕竟它是一门建立在理解自然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的科学，是一门按照这些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社会的科学，还是一门——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科学。

恩维尔·霍查向毛泽东提起了许多指控，其论点我们会一一讨论，但最明显的是霍查完全无法理解辩证法的活的科学。革命中国一直保持前进，并与霍查认为的敌人作斗争时，霍查就一直在摇摆不定；但由于中国的前进方向被暂时逆转，他的摇摆不定就变成了敌对，而（对毛的）这种敌对正是霍查在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想尽力避免的。

事实上，在霍查对毛路线的极少正确描述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他（毛）把（革命）看作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以来周期性地重复，是一个从失败到胜利，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永无止境。”^[1]当然，在原文中，霍查试图暗示毛认为人类社会没有进步，只是事物的周期性重复。但更为明显的是（对毛的这种庸俗化并不会影响到任何研究过他作品的人），霍查对于革命的看法是不恰当的，他认为革命是对历史进程偶尔必要的干扰，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强加给历史的，工人阶级（就像有着个人利益的居高临下的救世主）

一旦从旧剥削者手中夺走权力，这种干扰就会结束，沿着其“不受阻挡的”、沿着长而宽的涅瓦大街达到目的。这与地球上许多宗教愿景中的“神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那里，所有的冲突、斗争和不和谐都将被完美的和谐稳定所取代。

霍查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又将自己与现代修正主义区别开来。结果，他不仅接受了修正主义的一种基本观点，而且采纳了许多经过时间磨损的修正主义论点，这些都被教条主义者的外表所掩盖。因此，给他打上一个标签——教条修正主义。

《帝国主义与革命》涉及许多话题，要处理其中的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需要一本比它更长的书。本文只讨论其第二部分第三节：“‘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在这里，还不能说清霍查在各个方面（对毛思想）的歪曲、错误和诽谤。尽管如此，本文的内容足够详细，是了解霍查反革命路线的一次美餐（事实上，它不仅只能填饱肚子）！

一、霍查谈中国革命

在恩维尔·霍查看来，自从1935年以来，中共一直被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统治，这一年毛的领导地位在党内基本确立。按照霍查的说法，正确的是王明所代表的路线，尽管这个叛徒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书中。王明在中共党内领导了几年，直到他的路线在1935年（失败后）被推翻。他在党内的生涯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的政治路线一贯有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二，他获得了共产国际，大概也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和）信任。

那些获得中共领导地位的、同样持有王明路线的人（他们有时自称“国际主义者”，有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声称他和少数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是“100%的布

尔什维克”）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崭露头角。他们拒绝承认革命在 1924-1927 年失败后经历了一段暂时性的挫折，从而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战略防御。

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具体情况作出了分析，确定了在现阶段革命受挫之时，可以在中国各敌占区内建立农村根据地。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农民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力量（而不是领导力量）。建立根据地的首要任务（一或者说核心在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人民，进行土地革命。

王明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以及在从这些问题引出的许多政治和军事问题上，都强烈反对毛泽东。与霍查一样，王明也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像霍查一样，他不能理解革命的低落和退潮，相反，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领导一次对反动派迅速而成功的进攻的客观条件无比成熟有利，必要的只是改变主观条件。王明领导党走了一条错误的军事、政治和思想路线，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蒋介石击败，迫使红军在著名的长征中撤退。由于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量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士兵以及根据地都被消灭了。

众所周知，关于这些错误的政治总结是毛泽东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在否定这一路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著名的长征，也成功领导了中国革命。

然而，恩维尔·霍查，像王明和苏联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指责毛的路线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农民心理”和“机会主义”。只因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了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了一条能够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全方面的政治路线。

让我们看看霍查对毛泽东攻击中所提出的一些深刻的论点：

毛泽东在他的命题“农村包围城市”中表达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革命的村庄，”他写道，“能够包围城市……农村工作应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工作则发挥次要作用。”毛泽东谈到农民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的作用时也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所有政党和力量都必须顺应农民及其意见。“……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写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是农民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2\]](#)

这就是恩维尔·霍查的想法。我们要问的是，是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中党的工作中心都必须在城市呢？如果在一个农民占人口 80% 的国家进行革命，如果革命要素被驱逐出了城市，如果运动暂时低落，如果农村有形成红色政权的可能性——就像中国一样——怎么能说使“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或者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错的呢？在这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只意味着快点在敌人面前投降的鲁莽的冒险主义政策。实际上，因为这种把工作中心集中在城市，拒绝“农村包围城市”的“左倾”路线，使得党无法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动员革命力量。

霍查在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将“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时的咄咄逼人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历史上，毛泽东的这部经典著作也受到了从陈独秀和王明到苏联叛徒等修正主义者的攻击。

毛泽东在调查农民运动时指出，不是无产阶级不领导农民，实际正与之相反。毛泽东反对党内领导层的主要右倾倾向（在形式和内容上），他们认为搞农民运动糟透了，或是它“走得太远了”。那些认为农民运动“走得太远了”的人认为农民运动正危及到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同盟（以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因此应该反对农民运动，忽略它，至少把它边缘化。

当霍查引用毛泽东的话“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时，他故意省略了下面能揭示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全部目的的几句话：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3\]](#)

所以很明显，毛泽东所说的不是农民领导党，恰恰相反，是党挺身而出，把自己置于农民运动激流的最前方。

斯大林本人同样也谈到了中共主要成员犯下的错误：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人物行动中那种对农民冷漠和“不介入”的态度了。[\[4\]](#)

恩维尔·霍查对农民的鄙视和他对农民在中国等国家革命进程中核心作用的低估，都与他无法理解这些革命的本质有关。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和斯大林，首先阐述了亚洲国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些革命的主要目标有两个：驱

逐外国帝国主义和与其捆绑在一起的买办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中国现阶段（1927 年）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 [5][5a]

霍查则指责说：

毛泽东从来就不能理解和正确解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反，科学地证明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中国式墙壁”阻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这两次革命不必分开太长时间。毛泽东则断言：“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8]

这时，精明的读者就会问了，霍查用他的两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呢？第一处删除的是毛泽东写的一句话，“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第二处，抹去了句子中出现的短语，“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删去了斜体的地方）[9][9a]

由此可见，霍查省略了毛泽东著作中几个关键点：（1）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2）这种过渡取决于“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

霍查接着说：

毛泽东坚持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包括了整个革命

时期，甚至要到解放之后。在 1940 年，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 [10]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霍查引语中的整段内容将在下面给出，它们都是从已授权的中文译文中给出的，没有任何他的省略号：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11]

所以，要再次明确的是，即使霍查试图扭曲和歪曲每一篇著作了支持他的诽谤，毛泽东也清楚地表明了，一旦满足了必要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会导向社会主义。他特别指出要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霍查说，没有所谓“中国式墙壁”把革命的这两个阶段分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真正想做的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在革命的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必然涉及阶级力量的不同构成，也有着不同的任务。霍查想要做的是把所有东西都拼凑在一起，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一种没有固定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中本质上是相同的。

霍查的路线满含折中主义，混乱得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在说些什么。1949 年前的中国革命是（或者应该是）社会主义革

命吗？他难道不是在重复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的路线和主张——在一两个重点省份夺取政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吗？毛泽东真的不能认识到革命会转变成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吗？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是毛泽东，而不是霍查或者王明是正确的。[11a]

霍查故意把社会主义革命能完成民主化任务的事实（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概念混淆起来。毫不奇怪，尽管在他书的前半部分，霍查为世界上每一种国家指明了他所认为的革命道路（真的是这样，他并没有针对单个国家），但他对革命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理解，实际上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混乱。

这种联系（发生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与殖民国家的斗争之间的联系——J. 沃纳）在今天更加变得清晰和自然了。当年，随着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大多数人民通过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朝着独立迈进了一大步。完成这一步之后，他们还渴望走得更远。他们希望对新殖民主义、任何帝国主义性质的依赖和外国资本的剥削进行清算。他们想要获得完整的主权、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现在已经证明，通过消除对外国统治的依赖、对本地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进行清算，他们的这种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反帝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和交织，通过反帝与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些革命运动为伟大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帮助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反之亦然，通过打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摧毁其经济和政

治地位，社会主义革命为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和便利。[15]

尽管霍查在这里提到了“大地主”，但在这段文章中，和在霍查的整本书中，明显缺少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革命的反封建性质的讨论。特别是反封建斗争，它使民主革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

在上面的陈述中，霍查巧妙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同起来，说独立、主权等只有“对本地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进行清算”才能实现。归根结底，从帝国主义中真正解放出来只能靠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多次提出这一点，包括他著名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一样的，后者中，某些资产阶级（即剥削）势力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霍查企图宣称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但斯大林在写给另一个叛徒的作品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霍查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6]

与霍查的主张正相反，毛泽东解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自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非独立国家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在中国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由于受到

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阶级具有矛盾性，虽然它不时地会加入到革命斗争，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一定程度上仍然与大买办资产阶级勾结，所以它总是摇摆不定，有时会甚至会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投降。

正因为如此，领导人民，首先是农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事实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新（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而且这种革命并不会导向“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17]

毛进一步解释说：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18]

毛泽东不断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联系，只有完成了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才能为社会主义

革命铺平道路，没有这些先决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还肯定，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使革命能够超越民主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

毫不奇怪，霍查不能理解或（假装不理解）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实质，他也攻击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人民战争——这建立在对中国的正确理解之上。在为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开处方的过程中，霍查这样说：

根据一个国家具体和总体情况，武装起义可能是突然爆发的，也可能是长期性的革命过程，但绝不是无穷无尽的一一这就是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理论中所倡导的。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关于革命武装暴动的理论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进行比较，就会明显看出这一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科学性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教导，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党领导下的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认为农村是武装斗争的唯一根据地，忽视了城市劳动群众的武装斗争。它主张农村必须包围被认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据点的城市。这是对工人阶级不信任的体现，是对其领导地位的否定。[19]

有趣得很！霍查的上述言论更清楚的表明了他之前认为毛泽东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看法。

霍查宣称毛泽东对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这实际上是荒谬的。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说明过，战争（事实上，在中国的环境里，是三个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战争——首先是对国民党，然后是对日本，最后又是对国民党）在它完成

了它的第一个目的之前——具体说来，是驱逐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将是革命的基本形式，这是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在霍查对人民战争的批评中，他的形左实右本质开始凸显。有人会问霍查，1924-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应当走怎么样的道路——在反革命势力在城市取得胜利，共产党人被屠杀的时候？霍查的回答显然会是一——不像毛泽东那样建立长期扎根农村的根据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要在几年内战胜反动势力，快速达到胜利——这条路线实际上是王明的路线，他命令红军继续进攻，宣扬敌人正在瓦解，预测革命很快会达到胜利。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中国革命受到巨大挫折，南方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使长征成为必要。

我们可以假设，按照霍查的说法，如果不能马上有一个明确的胜利前景，那么进行武装斗争就是错误的。如果不能迅速占领城市，那么在农村维持红色政权，就是抛弃了工人阶级，丢掉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真正的机械思想，接近了迄今为止几乎不为人所知的“高度”。尽管中国革命期间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有过这种路线（尤其是托派分子），但只有到王明从莫斯科安全地返回后，才能在历史证明这种路线的错误之后重复这种谬论。

霍查会让中共解散红军，或者就是在条件还没成熟到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对城市发起草率的自杀式攻击，这也意味着红军的解散。霍查真的相信，“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会在农村没有根据地，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被迫在城市里进行非法或合法工作的分散力量时得到更好的行使吗？这种情况真的会加速中国新一轮革命热潮的发展吗？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政策难道实际上不是通过斗争为后来占领城市作准备的吗？

我们不禁要问霍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著作中，关于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明确

路线方针在哪里？当然，那里是没有这样的处方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不像霍查，他们不会对尚未出现的情况进行推测。中国革命以前，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领导过革命，要我们拿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其他早期马列主义领袖的军事著作比较，来发现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很愚蠢吗？事实上，当我们进行这样的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超过以往任何一位伟大导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作出的贡献是无价的。^[20]这毫不奇怪，因为毛泽东在发动革命战争方面的经验比以往任何一位领袖都要丰富得多。霍查还应该注意斯大林在 1926 年对这个问题的声明：“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21]

霍查的教条修正主义使他无法理解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对立面是不能互相转化的（稍后详述），他不明白在中国，革命战争本身是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工作的主要手段。毛泽东在指出长征的重要性时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22]

可见，革命战争不仅是一项军事任务，更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那些坚持革命必须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的人——即在长期的准备阶段，斗争主要是以政治形式而非军事形式进行，随后才是暴动和内战——会谴责中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根本没有进行革命。❖ 况真的会加速中国新一轮革命热潮的发展吗？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政策难道实际上不是通过斗争为后来占领城市作准备的吗？

霍查宣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事实上，不在农村发动武装斗争，才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尤其是会放弃中国的数亿农民。

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最主要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必然是革命的主力军（霍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无产阶级的领导，意味着把被压迫群众团结到工人阶级的旗帜下，团结到（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纲领上。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党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前面，同时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推向胜利，直到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看，不发动农村战争，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也就丧失了革命的可能性了。

为什么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革命那样先在城市取得胜利，然后再扩展到农村呢？因为（在中国）城市不仅被认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据点（如霍查所说），事实上，它也是这样一个据点。城市集中了敌人的军队，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很容易到达城市，他们可以最有效地援助城市里的反动势力。工人阶级也集中在城市，但还不够强大，条件也不够成熟，不足以成功发动起义和夺取政权。事实上，工人曾经试图发起过这样的暴动，但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淹没了。

要做一个类比，我们可以全世界的情况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会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西欧国家。直到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时候，这个理论才发展为革命会首先在帝国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发生。列宁被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指责放弃了无产阶级，因为列宁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俄罗斯这样仍然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当然，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是正确的。同样地，在中国，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在农村（土地问题），在那里，反动派的力量最薄弱，无产阶级可以领导群众建立和掌握政权。

霍查试图让人觉得毛泽东认为，在每个国家，都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恰恰相反，毛泽东明确地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暴动，是（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夺权之路。此外，毛泽东从未认为，在所有的非独立和殖民地国家，革命都会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农村包围城市）。一开始，他认为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可能性，原因有很多，他详细分析了这些原因（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征服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广阔国土给予了充足的机动空间；等等）然而，革命斗争的发展，尤其是亚洲革命的发展，却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路线，在中国之外还有更多的适用性。例如，越南的武装斗争基本上是首先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发展起来的，尽管在任何的两个国家，夺权之路都不会完全相同。

虽然可以肯定，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路线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都不是万能的。但同样可以肯定。这是许多个民族所走的道路，也将是许多个（这类国家和）民族获得胜利的道路。反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路线，就是反对被压迫国家的革命。霍查胡说：

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의思想和教导相反。这是毛泽东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23]

当然，霍查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毛泽东认为农民应该领导工人阶级——事实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了与此相反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毛的著作中被重述了几十次。霍查所能做的就是说，因为毛认为党的工作必须集中在农村，因为毛认为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内部矛盾，所以毛一定是认为农民在领导工人。

毛泽东明确且正确地说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24]认为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斗争必须要抛弃或扼杀，直到工人运动达到高潮，这才是背叛革命。

事实上，毛泽东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占领导地位，在革命的两个时期，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断地背离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分析了这些倾向，揭示了它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基础（霍查完全不会分析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在打击中共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时（以王明为代表，霍查眼里的英雄人物），毛泽东提供了一些观点，这与我们关于霍查的讨论非常相关。这一段值得引述：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

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25]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倾向有着敏锐的认识，并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阶级基础。例如，在上面引用的同一著作中，他谈到了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的问题，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他强调需要“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否则这些人就会“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

[26]

当然，这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长期而严重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 1976 年被走资派夺权。很明显，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重视寻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适当方法。

是霍查，而不是毛泽东，提出了小资产阶级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这条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正像上面毛总结的——在实践中，在斗争达到一个高度时要求迅速的胜利与鲁莽的前进，如果没有胜利的前景，就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农民的领导，把工作集中在城市里，等待（即投降）直到更有利的条件出现。

毛泽东、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

霍查努力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一个大中国沙文主义者，他试图造出毛泽东不遵从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基本路线、不将苏联敬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并胆敢批评斯大林的假象。霍查在这方面的看法很混乱（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对他来说很平常），是错误的观点、半真半假的说法和彻头彻尾的胡扯的杂烩。

事实上，任何研究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明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支持斯大林和苏联，其多次将苏联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并以这种理念培养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以及在苏联内存在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对全球政治局面改变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下面的陈述绝不能说是在低估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性：

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27]

就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来说，毛泽东实际上同意了由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基本路线。我们已经看到，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与土地革命所起的特别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武装革命直接对抗武装反革命的事实——背离由斯大林制定的基本准则的是霍查，而非毛泽东。

毛泽东所确实坚持的，是中国革命无法像某些教条主义者所咬定的那样成为俄国革命的复制品，进一步说，通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整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任务仍然存在。此外非常清楚的是，当斯大林，尤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想要更具体地绘制出中国革命的方向时，其对中国革命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

这在很多场合中都可以发现。在 1924~1927 年革命中，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尤其是鲍罗廷——与国民党和蒋介石一起支持“团结高于一切”的路线，在革命中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如毛泽东所言，“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28]虽然必须说鲍罗廷走到了共产国际一贯坚持的许多立场的右边，但单凭这一点无法解释其错误。蒋介石曾经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这个位子他一直坐到他本人性质已经清楚呈现出来的 1927 年，此外，此外，斯大林本人也不切实际地期望国民党武汉政府（他错误地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继续与共产党结盟。

非常清楚的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了错误的建议，除了恩维尔·霍查，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鲍罗廷本人在 1939 年对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我错了，我不懂中国革命……我犯了太多错误了。”[29]

即使在对数以万计的党员、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开始之后，有着鲍罗廷和其他共产国际代表支持并且职位高于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仍命令工人解除武装并试图制止农民运动，这一切都是希望安抚所谓的国民党“左派”。

我们方才见到在动员农民的关键作用上总体坚持了正确路线的斯大林本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还在 1926 年 10 月向上海方面发电报称，上海被（革命军）占领之前，农民运动不应过火并应敦促其“谨

慎克制”。斯大林承认这封电报是个错误，并指出他“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没有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 [30]

斯大林几周后撤销了电报，11月共产国际的决议正确地强调了动员农民的必要性。但电报起了一个严重的破坏性作用，其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声望借给了由陈独秀和鲍罗廷所推行的右倾路线。

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段重要陈述也同样帮助说明了霍查的错误观点：

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说来，这些“领导者”不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远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怜的领导者领导的基本结果。 [31]

对比斯大林的陈述，霍查一如既往的混乱见下：

在这一时期（1935 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在反对诸如“教条主义”、“现成方法”、“洋八股”的口号下展开了一场“理论的”运动，提出了制定民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适性。用其所鼓吹的处理问题的中国方式，以及“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取代马列主义，并以此传播了在各个国家马克思主义应有其独特内涵的修正主义观点。[32]

在展示毛泽东于霍查所“引用”段落中到底说了什么之前，值得一提的是霍查完全否定了斯大林所号召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简单地嘲笑了认为“洋八股”和“现成方法”将会是党和革命运动内的一个问题的想法。其目的非常清楚，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的呆板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运之上。至于对毛泽东拒绝了“马列主义的普适性”的指责，我们将再一次让毛泽东为自己说话——并再一次从霍查“引用”的那一段（及之前一段）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3]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穿恩维尔·霍查试图犯下的令人作呕的污蔑行为，以及其自身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事实。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是普适的，因而其能够且必须应用于各国具体环境。当然，这并非毛泽东的新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尽管这一信条未能在霍查的思想中找到。反对不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此而言还有毛泽东，在他们革命实践的锻造中所发展出的分析、规划、策略可以简单地套用于任何一种环境——才是对整合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运动的实际操作的真正“拒绝”，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彻底清除。这将只会导致无产阶级党的被击败和革命领导者的投降。

我们同样可以从霍查的污蔑中看到其为歪曲毛泽东所真正讲过的话而作的刻意努力。霍查指责毛泽东“传播了在各国家，马克思主义应由其独特内涵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内涵获得了一个具体的“民族形式”。是霍查没有能力认识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差别，或者他选择说谎来混淆是非。

毛泽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不幸的是，在中国革命史中，1927年并不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向中共提出错误建议的一年。我们已经指出，在被证明错误很久之后仍被霍查如此偏执地维护的王明路线，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共产国际，也许还有斯大林的支持。从1935年起，在抗日战争年代里，王明总体上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并再一次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要求成立“国防联合政府”，以直接反对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王明此时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与共产党团结的条件——即蒋介石控制红军。当然，毛泽东积极反对并挫败了这一路线。

这一路线在1945年随日本的失败而被以更清楚的形式暴露出来。那时斯大林极力主张中共应放弃在任何可见未来内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代之以在蒋介石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争取合法角色的行动*。伴随着日本人的被击败，毛泽东确实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同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都必须建立在确保中国共产党自身、其根据地及军队的独立的基础之上。在1945年，毛泽东提出了“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著名论断，作为一个对那些认为应解散人民军队并无条件地被吸收入蒋介石政府的人的直接谴责。应当指出的是，当时中共所被催促执行的这条政策正是当时许多西欧共产党（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所追随的路线，这一路线的结果是使一切革命前景丧失。

而后在 1946 年，借苏联在战时向各主要帝国主义力量盟友妥协（的行为）为掩护，修正主义之风在全世界各共产党中大吹起来。毛泽东（对此）做了非常立场鲜明的声明：

这种妥协（指苏联为反抗法西斯侵略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国家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实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党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34]

以下的是史实。毛泽东领导党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反革命的解放战争）并在 1949 年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直到最后斯大林仍怀疑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能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蒋介石政府周旋。

但不像霍查，斯大林迅速承认了其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及（这股力量）击垮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而取得胜利之可能性的错误。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很荣幸被证明是错的。

尽管霍查指责毛泽东把共产党内的失败与偏差“归咎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35]，但实际上，毛泽东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坚持盲目地跟从他人及企图利用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的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再次浏览霍查从毛泽东处所摘文本并将之与真实文本相对照是有价值的。霍查强调毛泽东称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36]

依霍查所言，这个引句及其他的一些观点是毛泽东“攻击斯大林，企图贬低他的工作和权威，把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世界领袖的地位，一直在奉行正确无误的路线，第一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7]

事实上，霍查所使用的引句不仅不是一个“贬损”斯大林的尝试，反而它是来自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攻击进而保卫斯大林的段落，霍查所（有选择地）引用的段落上实际上是这样写的：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38]

这份陈述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该陈述写于1956年4月，距赫鲁晓夫发表向斯大林问罪的“秘密报告”仅仅一个月，而在那时候包括霍查在内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没有看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次，在概述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时，毛泽东没有提出任何一件在中国不为人知的事。他所强调的是，尽管有这些错误，但斯大林仍必须被拥护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毛泽东还谴责了那些跟随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们。

有趣的一点是，在霍查自己的书中，他不敢重复（以前说过的）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在其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启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几年内所发表的言论中找出（某些跟随他的宗派还在散发这些谎言）。这些指责与公开事实完全不符。不过，通过声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

也投入到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公开冲突后”[39]，霍查试图将这些谎言从后门塞进来。以下由毛泽东在1956年11月所做的声明明确了毛泽东对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0]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还“不十分信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党“不太认可”赫鲁晓夫的本质之时[41]，毛泽东已了解斯大林问题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本质。我们徒然地在霍查选集中搜寻，寻找任何在50年代这一时期其展示出的任何关于“苏联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的接近毛泽东（水平）的理解，（但）能找到的只是（霍查）对在二十大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人（如南斯拉夫人）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攻击的便利攻击社会主义（这一事实）的承认和对苏联软化了对南斯拉夫的立场的抱怨。[42]同时，即使在

这方面，当霍查确实正确地攻击铁托显而易见的修正主义时，霍查的抱怨中也常有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弦外之音，这以霍查表达对“南斯拉夫军队在‘拯救’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的借口下入侵”[43]的恐惧而体现。重点不在于这无需有的恐惧上——因为这种恐惧情有可原——而在于阿尔巴尼亚党选择再版的该时期作品中无法展示出霍查作出过任何对苏共二十大中产生的总路线进行分析的尝试。

当然，至少有一部分在其选集记录中提到的霍查著作没有在新版霍选中再版。这（一著作）是《在 1956 年 11 月 8 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立 15 周年典礼上发表的演讲》[44]该演讲（内容）与由霍查“同志”所写并于 1956 年 11 月 8 日刊登于“Pravda（真理报）”的文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 15 岁了》[45]在表面与本质上都一致，霍查指出，“（该文）被一字不变地刊入真理报。”[46]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党不乐意再版该文（的行为）并不太令人惊讶，因为事实上，（这篇文章）在攻击铁托修正主义的同时，其给了二十大（在反对修正主义层面上）几乎不合格的支持。[47]

当然，并非说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一开始便对每一个问题绝对正确，否则他便会被打上叛徒的烙印。相反，问题在于，霍查怎能在证据证明他动摇、背叛了其对正在发生事情的片面理解时辩解其自我拔高，并试图假装自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老大哥”，哪怕他无法提供任何在层次上接近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对在苏联取得统治的修正主义的分析呢？

再后来，中共“深入”到与苏修的公开冲突便更不在话下了。显然，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几乎无需指出）针对在 1960 年 4 月 16 日第二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论文进行了公开的进攻，并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反击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在 1960 年 6 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会议上继续这场进攻。当月晚些时候，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代表“……为确定所有党派的会议的地点、日期，除此外，他们还将讨论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分歧”而见面，这一描述会议目的的引文来自恩维尔·霍查当时所写文字，他接着说：“我们不仅要听苏联同志所说的话，还要听中国人所说的话，然后再在讨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48]当年晚些时候，当这样一个会议召开时（指1960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霍查（所发表）的演讲显然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和立场——支持中国对第二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新”论调的拒绝——阿尔巴尼亚人已经认定为正确的拒绝。

对于霍查来说，他要把自己作为反对苏维埃修正主义的领导者，并指责毛泽东“摇摆不定”是无比荒谬的。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要对霍查关于中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做出彻底的批判，是很难的，因为他书中的这一部分更是充斥着折衷主义、恶意中伤和蓄意的伪造。他的基本论断似乎是“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49]

霍查论点的核心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享政权”。他陈述说：

只有无产阶级坚决地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除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只要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只要资产阶级还保留特权，中国建立的国家政权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中国革命就不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50]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败了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了。毛泽东正确地提出，凡是反对封建

主义、帝国主义的人民，凡是愿意接受基于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利益的社会秩序的，都应当在新中国拥有权利。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意味着，符合这些标准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或民族资产阶级——应当包括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专政中，至少在当时，不是这种专政的专政对象。这一分析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理论——正确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本质——它的目标、动力和盟友，尽管他们是摇摆不定的。

同时，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甚至在全国胜利之前，就提出了新政府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型的基本政策。毛明确表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51]

推进革命的这一战略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当时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 10%，而农业和手工业占 90%。毛泽东指出，这种情况下需要民族资产阶级来参与经济，并在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从根本上说，现代工业的存在使得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指出：

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

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52]

毛泽东接着说：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53]

因此，毛泽东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的路线，绝不是霍查所说的所谓“陈词滥调”的嘲讽，而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有着明确的认识。同时，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中仍然保留有巨大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在其中资本家仍然起着一些作用，不能立即被消灭。他认为：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

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J. W.）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54]

这就是霍查所说的所谓优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

猜测到读者可能会好奇，霍查是如何对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政策和列宁俄国内战后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比较的。霍查引用列宁的话，他说：

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只要交通运输和大工业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么无产阶级国家便没有什么危险。[55]

霍查评论道：

事实上，无论在 1949 年还是 1956 年，毛泽东在提倡这些事情时（发展重工业），中国无产阶级都没有掌握政权或大工业。

此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长期内战破坏了经济，所不得不实行的措施，它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现实中，在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一年后，他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准备进攻经济中私人资本的口号。而在中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设想为是永久保存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秩序，必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这就是所谓“毛泽东思想”。

[56]

这是典型的歪曲和谎言的集合！首先，1949 年解放后，政权和交通运输，以及大工业的关键部门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当时政权显然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手中，至于运输业和大工业，霍查“幻想”它们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霍查认为，如果他幻想出些什么东西，并把它写在纸上，人们就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它。这也许就是他试图在他周围形成令人遗憾的“国际”的真实情况，但这个“国际”永远不会被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所接受。

最有趣的是，霍查选择了强调“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所不得不实行的措施”这样的字眼，而在中国的具体情况，立即没收所有资产阶级资本的好处要比俄国小得多。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中国比俄国落后得多，这不是几年内战的结果，而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蹂躏、扼杀、阻滞的结果。这些都是毛泽东采取他所采取的政策的具体原因。

至于霍查巧妙地观察到列宁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好像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和他断言“毛泽东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被永久保存”。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像列宁对一个同样“杰出”的论战家（即考茨基）所批判的一样，他（考茨基）是把一个明显很愚蠢的看法扔到他对手那里，然后对看法加以驳斥。这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使用的办法，或许这人也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革命理论将在下面得到更充分的论述，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期，当时的重点仍是巩固对帝国主义、地主和与前者联系起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

的胜利。毛泽东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确保中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他采取了具体的社会主义措施，确保社会主义的国有部门主导经济，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了激烈的斗争，以明确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为群众斗争做好准备。

早在 1952 年，毛泽东就开始对刘少奇的“综合经济理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个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将会是社会主义工业、私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和谐结合。虽然毛泽东确实指出，城镇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不能一蹴而就消除，它们中有一些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开始，试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相当于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在毛泽东 1952 年 6 月的声明中得到了表达：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7]

毛泽东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那么，这是不是意味这所有资产阶级的财产可以立即被没收，或整个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被一下子剥夺权利？不。中国经济的现实还需要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参与，还需要赢得群众的支持，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解放贫农和中下层农民，推行农业集体化。当然，也要利用和争取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

又一次地，毛泽东自己的话对读者来说比霍查的描述要有用得多：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

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58]

上面写于 1953 年的声明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的路线，是与霍查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直接矛盾的。由此可见，霍查所谓的毛泽东主张在“中国解放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秩序”的说法再次与事实相反。毛泽东把解放后中国的民主“秩序”看作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是与其他进步势力结成联盟进行的（事实上，这与在俄国的形式略有不同），尤其是农民群众（稍后会详细介绍）。此外，任何熟悉中国革命的人都知道，在 1952 年至 1956 年之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基本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

此外，在农业建设中，最主要的是农村为将农业从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带领农民，建立了土改后在根据地建立的原始“互助队”，并在 1949 年胜利后让其在蔓延到整个中国。“互助队”具有社会主义要素，但它仍未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财产关系，因为它保留了土地私有制。毛泽东又率领农民组建高级合作社，实现了基本集体化，然后迅速组建大规模的人民公社，这将是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一直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使农民成为有工资的工人，实现向国有农场的飞跃。

为了进行这场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必须与党内主张“机械化必须先于集体化”，并通过援引没有集体化的苏联——苏联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实行集体化的经验来支持他们的论点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指出，要等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能提供足够的农业设备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后才进行集体化，会为革命带来灾难。土改完成后，农民之间迅速两极分化，有的农民富裕起来，有的则处于相对贫困。毛指出，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解体，工农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石（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更是这样）。

在城市中，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经营的工厂（如前所述，这些工厂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主导因素）或以公私合营为基础经营的工厂被收为国有。无疑地，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企业的前所有者在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产中都攫取了固定的利润——实际上，这是对工人劳动的一种剥削。将他们的财产没为国有有几个原因。首先，由于中国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在着手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毛泽东看到了不将每个资产阶级成员都视为革命的顽强敌人的一定策略优势。其次，运营某些工厂，仍然需要资产阶级的专业知识。这项政策与列宁著名的“贿赂”旧资产阶级的一些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为苏联国家服务的政策没有太大不同——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是必要的妥协。[59]

霍查等人利用这些政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改造后持续了数年这一事实，坚持认为中国从未发生过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是严重的扭曲行为。

以前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一旦国有化，就不能再说它们是资本主义企业了。这些工厂以国家所有的形式属于全体人民。生产水平和计划是根据国家计划中规定的社会总体需求制定的，而不是市场的要求，也不是根据盈利的需要。先前的股份所有者再也不能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其先前持有的股份，他们从先前所持有的股份中获得的少量利息也不能再作为资本再投资。同时，即使在那些以前的老板仍以某种身份存在的工厂中，他们再也不能对工作条件，工作规则等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工人的劳动成果不能再被私自侵占。简而言之，工业中已没有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了。

资本家获得的利息来自于工人的劳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可以认为是剥削的一种形式。同样，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资本，并必须为其支付利息时（以某种形式时），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剥削形式。但只有教条主义者和机械唯物主义者会争论（正如霍查所说的那样），无论大小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达成任何贷款协议。这完全背离列宁的政策，列宁愿意在任何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签订许多这样的协议。这也与斯大林的政策相违背，众所周知，斯大林从西方国家输入了几家工厂，包括福特汽车公司。（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更值得批评而不是效仿，但是霍查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表现出坚持斯大林而反对毛泽东，同时很方便地在斯大林与他的目的时相合时“忽略”斯大林的实际做法，这真是十足的虚伪。此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观点——某些情况下贷款协议的可行性上——斯大林是对的，而不是霍查）

提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着重指出：即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实际上仍可能以付息的形式存在一些构成资本主义关系的東西。甚至在社会主义内部，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要素，这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去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也是他再次与剥削者进行激烈阶级斗争的领域。

众所周知（尽管霍查似乎已“选择性遗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向旧资本家支付利息的政策被完全废除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统治者要指责“四人帮”（实际上指责毛泽东）“虐待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统治者要求将所有财产和利息归还给他们？——随着中国对帝国主义剥削真正迅速和大规模的开放！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中国经济基础的转变，离不开上层建筑领域的激烈斗争——无论在国家机构，在党内，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还是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关于“限制或 unlimited 资本主义”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成立后阶级斗争主要形式的预言得到了证实。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与人民政权一同发展起来的许多资产阶级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反对它。

这场斗争的大部分发生在在 1956-59 年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关键关头。正是在这些年中，毛泽东领导了为人民公社而奋斗以及“大跃进”其他方面的斗争——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也正是在这时，苏联修正主义胜利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这根本不是“秘密”的，但除此之外，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全世界政党中的修正主义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跳出来为修正主义路线而战了。与此同时，在东欧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反革命分子在反对“独裁”和要求（资产阶级）民主的招牌下出现了，并制造了一些浩劫。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反映，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霍查在没有对这一情况进行真正分析的同时，抓住这一口号，使人觉得毛泽东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论和无神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宗教要肩并肩，‘毒草’和‘香花’……必须被允许生长。[60]实际上，在此期间对毛泽东著作的任何实际考证都清楚地表明，“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与霍查所说的恰恰相反。

毛泽东分析说，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会消失或被法律所消除。他进一步指出，在包括工农在内的人民队伍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变成对抗矛盾，并给革命带来灾难。毛泽东具体解决了对抗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这种困难局面，这它们不彼此独立，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可能相互转化。就像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一方面，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支持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不被改造，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说，这个矛盾必须通过辩论和斗争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强迫或剥夺权利来解决。同时很明显，与这些未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与反革命分子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相互渗透，而且党内外各主要右派分子的许多目标，都是为了动员这些知识分子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也受到他对苏联经验总结的影响。这不仅涉及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兴起，还涉及对斯大林犯下的错误的分析，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工农业的基本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斯大林宣称苏联已经不存在敌对阶级——他也没有看到他们产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将在本文稍后讨论。即使在革命早期，当共产党和国家内部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问题才刚刚出现时，不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主要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他以后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认识到，看不到这两种矛盾的区别，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否定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否定了对那些企图复辟的人实行最有力的专政必要性；其次，不了解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通过辩论和斗争，以不同的形式处理，不这样做，就会将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从而增加了大批人民被反革命分子争取，并被动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毛泽东“百家争鸣”政策的核心。

认识到阶级斗争将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进行，并认识到先前所提到的国内外（反革命）条件正在联合，一场大战正在酝酿，毛泽东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人们被允许公开发表他们关于共产党的意见，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缺点的看法，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公开辩论。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出，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毛泽东特别提到那些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揭露和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他亲自起草行动方针，帮助群众从“毒草”中辨别出“香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61]

毛泽东没有幻想资产阶级右派在随后的斗争中会遵循这些标准。恰恰相反，他非常希望他们像他们在匈牙利的同伙一样，跳出来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恶毒攻击。他知道，无论党是否“允许”，他们都会跳出来，并试图通过煽动舆论来复辟资本主义。通过发布这六个准则（特别是其中两条），毛泽东为群众理清各种意见和政治观点的洪流奠定了最好的基础。

在 1957 年春“百花齐放”运动的最初几周，参加过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主同盟——一个资产阶级党派，对共产党发动了全面进攻。与前者有着密切联系的《文汇报》，也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此外，许多党员也参与了这场疯狂进攻。右派呼吁实行西式“民主”，并要求“共产党下台”。右派人士的各个据点，特别是大学中，都张贴了相同主题的海报。此外，还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支持党的海报被撕掉，人们被殴打等等。

毛泽东的策略是，退后几步，再等几个星期，让资产阶级右派跳出来暴露他们自己，让那些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党内分子去保卫他们。毛泽东没有认为资产阶级路线与马列主义之间有某种和平的“共存”，他率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右派发起了猛烈反击。在党和群众的反击下，资产阶级右派被迫仓促撤退，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西方媒体和中国的右派严厉指责毛泽东“忽悠”他们提出自己的反动纲领，供群众批判。毛指出：

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62]

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正是毛泽东在“百花齐放”运动中所做的。群众起来了，他们不允许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疯狂进攻发生。资产阶级右派们退却了，但毛泽东还在继续追击他们，拒绝因为一些“虔诚”的自我批评就让他们逃脱。那些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有资产阶级右派殴打甚至杀害他人的例子）被逮捕并绳之以法。尽管霍查试图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喜欢在周围充斥反革命分子的“开明者”，但毛泽东在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攻中非常明确地指出：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63]

此外，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权力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实际上，直到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政变后，这些反动派的权力才得以恢复。

“百花齐放”运动贯穿整个 1958 年。在 1957 年夏天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已不再进攻，墙报、报纸和电台重新回到人民群众手里，特别是工农群众手里。但对共产党的批评仍继续出现——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基于毛泽东的六条标准。这些批评有助于磨砺和锻炼党。人民群众的广泛辩论使他们对党的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更好的了解，增强了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和投身革命的能力。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百花齐放”运动是一所对党以及群众本身的重要学校。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

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6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百花齐放”运动被霍查和其他教条修正主义者（以及当时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他们污蔑“百花齐放”是“自由主义”）恶毒攻击的两个性质。首先，它是为了遏退反革命分子的反扑——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实行没收，以及国际上（尤其是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兴起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第二，“百花齐放”是对全国人民群众就意识形态战线进行全国性辩论的一次呼吁。这场辩论不能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教条修正主义者会对“百花齐放”运动耍这样的花招呢？当然，最明显的答案是，这给霍查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断章取义，颠倒是非，试图让人觉得毛泽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除此之外，“百花齐放”运动也使霍查陷入了混乱，因为这场运动与他本人对社会主义发展机械而错误的政治观点有出入。根据现在阿劳动党中的主流观点，群众会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抛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需要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需要突然爆发的狂风骤雨式的辩论和斗争，而是通过一个平稳的，

对群众进行“不间断”教育的过程——我们将看到，这种观点使霍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出了反革命的评价。

尽管对霍查总路线和阿劳动党的实践进行全面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仍值得将毛泽东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观点与阿劳动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态度进行对比。例如，1976年底通过的新阿尔巴尼亚宪法规定：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已不存在剥削阶级，私有财产和人剥削人已被消灭和禁止。[65]

但是，不管阿尔巴尼亚法律文件中写的是什麼，也不管霍查先生怎样禁止它，阿尔巴尼亚仍然像在中国一样，也存在着敌对阶级。宪法中的这一规定显示了法律形式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从现在角度看这一历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否定。

由于霍查不理解在对资产阶级进行没收后社会主义仍然存在敌对阶级（更多是后来产生的），他无法设想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陷进了形左实右——无法理解群众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会变成对抗性矛盾，无法理解是什么削弱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与霍查对“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所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密切相关的，是霍查对中共允许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存在甚至让它们在国家机构中有一定发言权政策的批评。霍查引用毛泽东的话：“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66]

霍查继续评论：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像中共那样，拥有同等的权力，是必要的。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的这些政党（据他说是“历史上的”）也应该在中国共产党消亡的情况下消亡，也就是说，它们将共存直到共产主义。[67]

让毛泽东为自己说话是最有用的，同样是在霍查“引用”的同一节中：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68]

可以看出，毛泽东说的话与霍查的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们认为，当霍查说民主党派是“历史上的”时，他指的是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的产物”的说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总有一天会消失。毛泽东并没有说民主党派会与共产党一起共存——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

毛泽东实行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政策的原因，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条件直接联系。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民主革命阶段，所以很自然地，应该允许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反帝反封建的，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在新政权中发挥一定作用。这不仅仅是要同这些政党高层的资产阶级人士团结起来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要团结受他们影响的人民群众，争取并改造他们——这不是一股可以忽视的社会力量。

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接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才能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任何形式的合作。霍查在上面提到的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享有同样权力的观点是荒谬的。领导革命的权力当然只有共产党才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主党派才能发挥各种作用。

毛泽东并没有幻想民主党派的作用。他指出，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许多政策，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同时，他指出：“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69] 只有这样一个走向不反对的过程，才能为长期合作提供基础，毛泽东愿为这种可能性敞开大门。

但毛泽东也为民主党派转向反革命做好了另一手准备。他在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70]

这样，毛泽东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政党解散和消亡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显然与共产党本身消亡的条件不同。“他们的表现”只能指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则指他们对工农采取什么态度以及还有没有值得联合直至胜利的阶级基础。

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基本上已不存在。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的形式——政治协商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力，通常也不召开会议的残余机构。显然，在毛泽东以及革命司令部的其他人的

看来，需要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除了某些跟台湾有关的人）。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霍查试图使这些政党的存在看起来与列宁主义不相符，但在苏联和其他国家都有着这种情况下的历史经验。例如，十月革命不仅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当然，布尔什维克党是其领导和推动力量），还有一些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与。列宁提议各党代表参加新政府（人民委员会），并写明了这种合作的基础。列宁指出，左翼社会革命党对农民有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愿意参加革命的农民，因此他认为，在夺取政权期间和以后必须与他们联合起来。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这种合作是短暂的，这不是因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分裂同盟的政策，而是因为左翼社会革命党起来反对新政权，特别是反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对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左翼社会革命党发起了猛烈攻击。该党成员之所以跳出来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权，主要是因为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打击下处于守势。在现实以外，列宁的著作里没有任何语句表明，同左翼社会革命党合作是不可能的。

列宁甚至说，“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71] 虽然列宁的这番话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如此），但由此称列宁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就错了，甚至是反革命的诽谤。关键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共产党人的原则，在执行它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情况可能（几乎一定）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即使有时在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上犯了错误，但这显然不是霍查提出这类指责的理由（更何况他并没有拿出事实说明毛泽东犯下了策略上的错误）。

此外，尽管我们在讨论“马列主义政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和不可分割的作用”^[72]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阿尔巴尼亚官方历史所承认的那样，解放后几年，“……该党即使已成为执政党，

也仍然处于半非法状态。党纲被藏在民主阵线的纲领后面。党保留了它成员的保密性。并且，CPA（当时被称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指示是作为民主阵线的决定公布的……”！^[73]这些政策是阿尔巴尼亚党自身在自我批评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们本身也说明了“一切由联合战线决定”的一些明显错误。

另一方面，毛泽东虽然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并鼓励与他们进行合作，但他指出，如果革命转向不同的方向（失败的方向），或如果革命受到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民主党派很可能会掉转头来阴险地反对革命。他讽刺地警告：“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许多人现在隐藏着。”^[74]

最后，有必要更全面地回到这样一个理论上，理解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中国国家的性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这个口号——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时候，中国革命仍处于民主革命的阶段。显然，所有这些阶级或多或少都对这场革命客观上有着兴趣。此外，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长期的战争和根据地的存在，这实际上意味着两个政权的相互对立。例如，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根据地（有 1 亿人口）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直接对峙。有这些根据地的存在，政府自然有必要镇压反革命分子，进行土地改革，为人民解放军筹集必要的物资，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内战期间，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政策在根据地贯彻实行。这四个阶级的所有政党、人士等都在权力机关有着代表。鉴于当时的革命任务，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有着这样的阶级力量——基本上是那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同时，这个由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政府，有了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因此，从一开始，“人民民主专政”

就具有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它代表着使民主革命胜利的力量——其中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另一方面，由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领导的政府，决心将革命推向社会主义，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回顾过去，很明显，后一个方面——新政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主要的，并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特征。到 1956 年，毛泽东把中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过渡。随后的中国文献也提到了，1949 年，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因此回想起来，很明显，1949 年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它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条件。

列宁在俄国进行的重要考察有助于阐明这一问题。他指出，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贫农组成的联盟，他们构成了大多数人民。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中国行使其统治所必需的阶级联盟形式（专政形式）会与苏联不同——由于各国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构成、革命胜利的路线不同。很显然，随着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联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联盟的性质将发生变化——因此毛泽东在 1953 年发表了“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声明。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撰写有关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时，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并没有（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领导长期）民主革命直至胜利和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历史经验。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只是建立在击败法西斯分子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共产主义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两种）无产阶级专政间有区别（顺带一提，新政府中通常有着几个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当时无法从理论上总结这些经验，况且无论如何，这些国家情况都与中国大不相同。因此，毛泽东着手处理的是一个崭新的

历史局面，他处理得非常正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认为，特别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政权就完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是虚伪至极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 1976 年政变之前发表的所有文献都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和支持他的革命者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此外，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表明，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和群众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他们既有梦想复辟的旧剥削者，也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然而，霍查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托洛茨基那令人厌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为什么中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国旗上的那些星星！

[75]

讨论霍查对中国到 1956 年基本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攻击之前，值得后退一步，问问为什么霍查对毛泽东的批评总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那段时期，并试图将他的全部观点都基于一个事实——据称那时，毛泽东与中国的旧剥削者“和解”。

恩维尔·霍查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是“坚定”的立场。毕竟分析社会主义下的阶级和阶级矛盾不是他的强项，他希望简单诉诸于机械、教条的思维以及改写历史就能让天真的读者相信霍查自己的反动结论。但更重要的是，霍查特意试图将讨论引向偏离其中心的地方——即如何防止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新资产阶级夺权和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最重要和最杰出的贡献。霍查不想，也不愿接受毛泽东的路线。他在这方面，将更加坚持斯大林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上的错误。此外，他无需担心向世界袒露阿尔巴尼亚党在这些问题上真正的折衷和混乱。他希望通过转移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其背后路线的关

注，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的旧剥削者身上，而事实上，这些旧剥削者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仅起到了次要作用。在试图以此为基础进行的讨论中，霍查实际上与目前的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他们渴望证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现在，随着政变的完成和每天不断地扯下身上的马克思主义红皮，华国锋和邓小平带回和赞颂了旧社会的每一个残渣和剥削者。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正是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发展。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这一真理得到了所有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们的承认。实际上，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党对毛泽东的这一贡献也做出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对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一点的认识，过去是，现在也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最重要的分界点。因此毫不奇怪的，当霍查试图推翻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伟大导师和领袖的地位时，他逃避直接面对毛泽东的理论教导，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与毛泽东在反修战线上共同战斗的革命者们发起了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攻击。

霍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既肤浅又反动：

事件的经过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它不伟大，也不是文化上的，最特别的——他最不“无产阶级”。这是一场全中国范围的宫廷政变，目的是消灭一小撮想要夺取政权的反动派。

很显然！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骗局。它清洗了中共党内和群众组织，使中国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这场革命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分子领导的，他们又被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消灭。[76]

由此，我们得到了霍查的基本论点——与真相相去甚远——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共产党高层少数领导人所操纵的派系权力斗争。这说明霍查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因而完全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性的教训。

霍查之所以如此厌恶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它与他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相悖的，在这种世界观中，稳定、统一、和谐是宇宙的主要特征，当然也是人类社会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混乱”（chaos）是恩维尔·霍查对文化大革命最喜欢的称呼，因为“混乱”——实际上是各种对立面的斗争，阶级斗争，以及革命本身——违背了霍查对世界和世界走向的看法，就像前文所述的，这种世界观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比，与宗教概念中的“天堂”有着更多共同点。在对霍查全面攻击毛泽东的思想根源——他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他在中国发现的令人厌恶的“混乱”——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教条修正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犯的最大罪过是发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夺取他们的权力——这些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按照霍查的说法，他不反对与文革的对象，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司令部作斗争（尽管我们会看到，他这种“不反对”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但是，掀起群众斗争地空前洪流，不按照党和国家制定的规矩去进行斗争，最重要的是，直接依靠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霍查这样写道：

当我们看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由党来领导的，而是毛泽东呼吁革命后的一场混乱的爆发，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一次革命的行动。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权威，使数以百万计的无组织青年学生召集起来向北京、各地的党和国家机构进军。据说，这些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向党

和无产阶级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种严重的情形沿袭自毛泽东反马克思主义的旧观念——即低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高估了青年学生的作用。毛泽东写道：“‘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

于是工人阶级就只能袖手旁观，他们反对红卫兵，甚至与红卫兵武斗的例子很多。当时在中国的同志们亲眼目睹了工厂工人与年轻人们的武斗。党解体了，它被清理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被完全忽视。这情况非常严重。[77]

设想一下！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亲眼看到”了工厂工人们跟学生们的武斗！霍查的态度跟亚当偷吃禁果后的表现如出一辙。很幸运，霍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去中国，要不然看到工人之间的武斗的话，他可能会当场死于心脏病发作。真正令人惊奇的，也是我们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是，霍查怎么能在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之后，却说出如此空洞的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委解散了，党的指挥链条的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被终止了，这是众所周知的——苏联修正主义者们一直把这当做毛泽东“唯心主义”和“极左”的证明（王明在莫斯科的著作——在那里他结束了作为苏修辩护人的一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读过他的著作之后，人们会建议他的继承者控告霍查剽窃！）人们明白为什么苏联人不想谈论被解散的党委的性质，他们所遵循的路线等等，同时，人们希望恩维尔·霍查能在这方面做得好上一点。但是正相反，我们只听到了些他关于这些党委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质的理解。一旦人们清楚了这些党委的本质，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路线是什么，这就不

禁让读者怀疑，尽管霍查再三强调，但他认为的被粗暴地“不公对待”的“共产党人”，正是与刘少奇站队的党内官僚。

毛泽东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所说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由刘少奇领导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已经成功夺取了许多关键的工业部门、城镇和省份的权力。邓小平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给党的指挥链条加上了锁链。修正主义在文化和教育战线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修正主义路线被许多工厂的领导人所拥护等等。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大举进攻，严重地妨碍了马列主义对群众的锻炼，他们大量使用党组织作为镇压和控制群众的武器（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毛泽东的“错误”或“唯心主义”造成的，我们很快会回到这个问题上）修正主义司令部的力量，不仅可以通过考察当时中国党内流动的一些文件和政策看到，也可以通过他们在文革中即使遭受了一些重大打击之后保存的势力表现出来。在 1976 年的反革命政变中，最主要是旧的刘少奇司令部，以及作为继承者的邓小平，还有一些忠于周恩来的官僚机构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的走资派们攻击革命获得的所有成果的激烈程度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速度，都表现出了这个阶级的真正实力。考虑到中国的情况，仅仅想通过改组党主要机构的组成，发出一两个指示，就希望能够清除这种势力的想法是可笑的。同样的，中国现在的修正主义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也指明了他们是毛泽东和革命左派斗争的对象，这不是简单的派系之间的非政治斗争，而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它决定了中国沿着什么路线，什么道路前进，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的问题。

霍查给中国革命者的建议，似乎又回到了马克思时代的机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和普列汉诺夫对 1905 年革命的老调子上，“他们不该拿起武器”。问题当然并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武装斗争，而在于是否要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针对党内高层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革命。而且，虽然文化大革命有着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特殊特点，但它像其他的任何革命一样，只能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推进。革

命中没有逆流是不可能的，不同阶层的革命群众也会把自己的偏见和局限性，有时候是相矛盾的观点和纲领带到斗争中去。同任何革命一样，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激烈而顽固的抵抗——不仅仅来自革命的目标——中国社会和党内的一小撮分子，还会来自群众中的一部分，甚至包括一部分工人，他们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时候可以作为反动派社会基础的一部分被动员起来。这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它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一般规律。这里不妨回顾下列宁 1916 年对爱尔兰人民在复活节起义的著名评论，它针对那些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嘲笑、轻视和诽谤那场英雄的起义为“暴乱”并以此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形成同一立场的人。

只有当起义的尝试仅仅暴露出一批密谋分子或荒唐的狂热者，并没有激起群众丝毫的同情的時候，才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盲动”这个词。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几百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和各种阶级利益的结合，这个运动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召开了群众性的爱尔兰民族代表大会（1916 年 3 月 20 日《前进报》），主张爱尔兰独立；它还表现为，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经过长期的群众鼓动、游行示威、封闭报馆等等之后进行了巷战。谁把这样的起义叫作盲动，谁就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社会革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的学理主义者。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

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78]

列宁的话狠狠地挫败了霍查把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持久、最有自主性的革命高潮诽谤成“全中国范围的宫廷政变”的教条修正主义路线。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霍查是怎么看待青年问题，以及青年作为革命的发起者所能发挥的作用的。他指责文革，因为“数以百万计的无组织青年学生”被召集起来向北京进发。霍查认为，这一“错误”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著名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鲁莽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青年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他称之为“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79]

同样地，我们必须同意毛泽东，而不是霍查。首先，对历史真实性有任何一点在意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先锋作用，这是一个事实。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青年“带头”、“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的历史实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今天，我们在伊朗又看见了这一情景，包括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年轻人站在一场宏大运动***的最前线，帮助发动了伊朗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在任何真正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进程中青年没有发挥带头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

但对霍查来说，年轻人的能动作用——他们的胆识、摧毁旧世界的欲望等等——与它的价值相比，更像是一种累赘，除非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领导”（他真正的意思是控制）这种作用，否则就要施

以镇压和扼杀。（和农民问题一样，问题不在于青年是否站起来，问题在于是要引导还是扼杀他们的能动性）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青年是什么意思？在霍查看来，这意味着青年应该被动地跟在工人阶级后面，而绝不能认为青年本身就有一种先锋作用，即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领导作用。

当然，毛泽东很清楚，总的来说，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在未被霍查引用的另一篇文章中[79a]，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基本的阶级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80]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霍查的观点分道扬镳。两人一致认为必须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这首先只能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分歧在于，这个领导的内容是什么？它想要达成的是什么？它领导青年人的方向是什么？

霍查引用的毛泽东的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顾名思义）的全部内容，正是为了给青年提供领导，提供方向：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81]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82]毛泽东在这里明确了正确地、辩证地看待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与工农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知识分子往往是革命运动中首先起来的力量，他们在帮助“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只有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为革命作出实际的贡献。而且，正如毛泽东在著作中反复指出的那样，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青年的世界观才会发生转变，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的样板。而不是像恩维尔·霍查所认为的“对青年运动严加看管，让青年顺从地跟在工人后面”。马列主义对革命的真正领导，是指知道如何把革命因素发挥出来，同时又为整个运动及其特定部分提供指导和正确的方向。真正的领导，不是要忽视或试图消除不同群众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在矛盾中扮演的角色），而是要认识和利用这些矛盾，把革命推向前进。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相比，恩维尔·霍查的观点与林彪的“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更相像。

只有一个无可救药到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等待对立双方整齐排好队，头上贴好明显的标签的人，才会去批评毛泽东认识到并利用这种青年在革命斗争中往往会起到一种先锋作用的事实。只有认为革命永远不会发生，或者不知道革命是什么的人，才会想在工人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庞大的整体团结起来的那一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到来之前避免动员革命群众和工人的各个阶层。因为只要存在阶级，就不会有工人们不被按照革命的、非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观念划分为阵营的那一天。这些分歧又会导致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与革命群众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甚至是肢体上的冲突）

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大力依靠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和胆识——不是要他们去取代工人阶级，而是在这场伟大

的战斗中帮助唤醒和动员工人阶级。霍查应该熟悉毛泽东对这一点的理解，因为毛泽东在 1967 年向阿尔巴尼亚访问团非常简洁地阐述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83]

可见，在理论上（实践上也是一样），毛泽东都把青年学生作为一种发起的作用。他充分认识到了他们在与革命阶级结合并使革命斗争走向胜利过程中暴露的弱点和问题——尤其是有倒向无政府主义，极左的趋势，有时也倾向于保守主义。如果运动初期没有学生，特别是英勇的红卫兵，修正主义在中国会更快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就永远不会有起色；如果没有工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and 领导力量，刚开始的胜利就会转向失败，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就不会得到巩固，同样会使修正主义更快的将中国演变。

霍查没有提到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因为这与他试图向全世界革命者炫耀的胡话不相符。但我们可以问，上海一月风暴——革命群众首次发动解散反动党委的榜样——中的推动力是谁？对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最不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场关键的起义主要是由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现在都被污蔑为“四人帮”——领导的上海革命工人组织完成的。这一幕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重演。

当红卫兵的一部分不能独自继续引导革命推进，走到了他们所应起的作用的反面的时候，什么发生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数以万计的工人走进并接管了大学。他们走进大学，留在那里，同革命师生、干部一起，发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战线的革命。所有这些成就，即便是恩维尔·霍查也不能否认。

最后，是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是由党领导的——这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唯一适合的形式。它是由党和党中央的领导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得到了党中央绝大多数的同意，领导它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84\]](#)毛泽东本人也提到，要“等待时机”，直到他能赢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才能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跟霍查认为的不一样，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以它是否符合列宁主义党内斗争的既定实践为依据。我们毫不含糊地说，即使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中央大多数人的反对，也就是说，就算中央被修正主义者所俘虏，毛泽东也有责任去号召党内外的群众反抗党中央。

我们要问恩维尔·霍查，当修正主义的胜利迫在眉睫的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应该怎么办？如果修正主义篡权事实上真的发生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果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后苏联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赫鲁晓夫，霍查会接受吗？或者，在赫鲁晓夫发动政变之前，苏联领导层中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绝对多数，起来号召文化革命呢？如果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修正主义的迫切危险——那么该允许党的领导者们发动学生发起革命斗争，还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镇压和扼杀学生？！毫无疑问，从霍查的全部论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革命党人不应该拿起武器（或者，就此而言，应该选择相对“和平”的政治斗争）。

当然，霍查的观点被包裹在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的外衣里，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教导相比，他把形式（“列宁主义的教条”）置于内容之上（不管这些理论形式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努力，实际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关于“民主”的典型的闹剧更为相似。列宁正是对这种做法表示了轻蔑——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归根结底，霍查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路线，更拥护文化大革命所要推翻的路线！没错，他咕哝了几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但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是没有内容的，至于对邓小平和华国锋路线的批评，霍查仅仅局限在批评“三个世界战略”上。稍后我们会看到霍查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路线，在本质上和刘、邓所提倡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差别，只是略微带有一点教条主义色彩。

实际上，霍查在自己书中对自己鬼话的掩饰工作做得很差。它的内在逻辑使读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刘少奇一方（或其他亲苏的修正主义者）获胜那就更好了。如果毛泽东思想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修正主义的变种，那为什么不去支持那些一贯以来都反对他的人呢？霍查声称，整个党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层的各派（至少在文革的十年里，王明当然是另外一回事）都不是革命的。那霍查为什么又要去说文化大革命“清洗了中共党内和群众组织”？如果“在中共的领导层里不存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85]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么谁在乎它有没有被清洗呢？

但是霍查对“清洗”的担忧是真实的，并不是虚构的。以他关于群众组织被清洗的说法作为例子。不是说所有群众组织都被清洗了。只有傻瓜才会否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无数群众组织涌现出来——红卫兵、造反派工人团体等等，后来在毛泽东路线和左派领导的基础之上，工会、妇女组织等也被重建了。由此可见，霍查真正关心的是，刘少奇路线控制的群众组织，例如共青团——被击败了，霍查在支持这些组织的同时，还疯狂去指责那些斗争中成立的革命群众组织。

而且，如果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背离了“马列主义”（霍查的意思是背离了苏联的经验，背离了苏联的做法），那么难道不应该支持那些为在中国执行“列宁主义”原则而斗争的人吗？阅读王明的著作（和霍查剽窃他的内容正相反）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抛弃了那些霍查认为仍然有用的欺骗手段。王明公开宣称，中共党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除了刘少奇一伙和被邓小平官复原职或平反的一大批叛徒以外，没有其他人。^[86]越南——霍查甚至在它完全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以后也在不断支持它——也明显地认为在中国，刘少奇和邓小平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87]

霍查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源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失败理解、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实用主义。在他关于阿劳动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可悲的戏剧性转变做的“解释”中，霍查无意中说出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重估”的实际意义。

霍查说道：

在判断他们（中国人）之前的可疑行为，还有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观察到的，特别是这场革命至今的事件，这个或那个领导集团的兴衰，今天的林彪集团，明天的邓小平集团、华国锋集团等等……这些都促使我们党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更加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88]

之后他又说道：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发展及其结果，尽管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更加印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观点。……^[89]

霍查在总结毛泽东时，明确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方向。

很明显，霍查并不喜欢 1976 年政变后的结果，特别是华国锋、邓小平借“三个世界战略”的旗号，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并结成了反动同盟。因为霍查自身的错误观点，使他无法从阶级斗争的参照点出发，分析中国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华邓修正主义总路线与毛泽东和与他并肩作战的四人的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他并没有承担起历史对他的要求——领导起保卫中国革命的成就和毛泽东的贡献的运动，他选择从中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出发（用最直接和最狭隘的方式去定义）努力在马列主义者自己的路线和行动中为“结果”找到根据。[90]

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一定错了。简而言之，这是霍查的出发点。由于霍查不能理解革命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他无法想象修正主义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不是因为革命者可能犯下什么错误（没有人会否认这样那样的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而是因为对立阶级的相互博弈。[90a]

不幸的是，这影响了一些真马列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在肯定毛泽东的贡献的同时，但又认定既然修正主义者胜利了，原因必须来自革命家犯下的错误。

在霍查这样的观点看来，这样的推论等于否认党要在真实存在的资产阶级夺权复辟的可能性面前保持“警惕”，也不需要无情地清理任何从党内浮现出的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动派、司令部和政治路线。这种观点的问题所在，以及它为什么会与毛泽东的教导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在于它把党内斗争同任何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分开来了。

随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分析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让我们看看霍查对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两条路线和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攻击：

毛泽东本人认为，党内存在“两条路线”，在他看来，两条路线的存在和斗争是自然的，是对立统一的表现，它既忠于各自阶级，又相互妥协。……

这些观点与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的教导是截然相反的，先锋队必须只有一条路线，思想和行动上必须是统一的。

党内的阶级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和毛泽东“两条路线”的思想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党不是阶级之间对抗的竞技场，不是要达成目的自相矛盾的人的集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以工人的利益为基础。这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捍卫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原则，意味着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共产党的许多对立路线的存在。斯大林强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铁板一块的政党，不是由不同阶级的人组成的政党。”

然而，毛泽东认为党是利益矛盾的阶级联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股力量，即“无产阶级部分”和“资产阶级部分”构成的组织，他们从基层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相互对抗和斗争。[91]

霍查在几方面上是错误的：错在他不懂辩证法；错在他不明白是什么赋予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生命和活力；错在他对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实际地位的认识，以及因此党内斗争所产生的不同特点。

首先，我们必须处理恩维尔·霍查最愚蠢的观点，即“毛泽东本人主张‘党内两条路线’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因此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倾向于或允许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正确地指出，党内两条路线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形成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路线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企图反复地建立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党和国家关键领域的权力，准备向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全面进攻的理论认识。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这一点，而且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了面对这一点的斗争。由此推断，毛泽东想让资产阶级存在，而不是向资产阶级开战，这完全不符合事实。[91a]

马列主义者始终坚持“自由是达到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哲学论断。人改造社会或自然的能力，不是主要取决于意志，而是取决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因为只有按照支配社会和自然的规律行事，人类才能影响社会和自然。说毛泽东希望资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存在，仅仅是因为他第一个系统全面地认识到它们存在的规律，这道理就像责怪路易斯·巴斯德鼓吹病毒的存在一样！

更进一步地说，正是因为巴斯德发现了病毒的存在，他才能研制出第一种疫苗；同样，正是因为毛泽东发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会存在党内资产阶级路线的规律，他才得以制定政策、战略和战术，去一次又一次击败资产阶级路线和各种资产阶级司令部。

霍查也许认为，他把鸵鸟原理运用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上，就是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创造性运用”的观点和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观点一样，即认为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对立阶级，这种对立就会消失。

在霍查展示他对党的“列宁主义原则”和斯大林“无产阶级统一政党”论述的庸俗化理解时，进一步暴露了他自己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发展完全不了解。霍查声称根据列宁主义原则“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共产党的许多对立路线的存在”。太棒了！霍查用一句话就抹去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任何可能的偏差的必要性。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难道就没有修正主义倾向？我们不相信！即使霍查坚持了马列主义路线，而不是拥护他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也依然不会相信。尽管霍查大声疾呼“列宁主义原则”，但列宁和斯大林仍然非常重视认清、反对和战胜布党内各种“反动倾向”。

实际上霍查以他典型且喜欢的方式所做的，是合二为一，而不是辩证法的一分为二。他把路线和倾向的问题和与之相关却又不同的派系问题混淆起来。一个政党中修正主义路线和倾向的存在，不是任何人给予它“许可”的。它们是社会阶级力量的必然反映，其存在也不依赖于马列主义者的“允许”，而是取决于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条件——这包括旧社会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残余。

一个政党中的修正主义派别可以被解散，它的头子可以被驱逐，但这不会也不能意味着党内不存在修正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路线。这不仅存在于全党内，而且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中！阿尔巴尼亚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绕弯子的做法，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允许党内进行“阶级斗争”，但否认对立路线的存在。真了不起！显然，霍查认为，通过消灭敌特、资产阶级分子和堕落分子，他能防止党内出现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路线——就像一条路线的存在取决于他是不是用打字机一样！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霍查，而不是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路线问题、路线斗争问题——不能不以不同路线的存在为前提——这是党的灵魂。

举几个例子。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以经济主义的形式出现，它减少工人的斗争，仅仅为给奴隶们在雇佣奴隶制下提供更好的条件——是一种有害而顽固的倾向。列宁在他的光辉著作《怎么办》和他后来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为它的出现指明了社会基础。但是马列主义者识别出这种倾向并致力于同它进行无情而持久的斗争，不意味这种倾向不会在党内体现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同样地，在许多国家，工人阶级和党的直接任务是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是实际的阶级力量在斗争中的反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同这些倾向进行激烈的斗争，特别是与它在党内的反映斗争。认识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认识错误路线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根源，才能使马列主义者战胜错误路线。“允许”的问题根本不是重点。

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是和霍查所说的“马列主义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92]相违背呢？只有不懂辩证法的人才会这样认为。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因为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因为工人阶级是唯一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因为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是“列宁主义原则”，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性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共产党理解为工人阶级的党是正确的。

共产党、工人阶级和马列主义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在观察工人阶级时这就显而易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小部分工人意识到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且，在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对政治、国家和经济等的观点也存在着分歧——尽管客观上所有工人都有相同的阶级利益。因此，谈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是荒谬的，事实上，这将否定对共产党的需要本身。在考察某一政党的实际具体存在和某一政党的路线时，谈论党和马列主义的“纯洁”也同样荒谬。这样做，就完全否定了进行党内斗争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正确地讥讽了认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若磐石”的观点（“有些人似乎以为，……共产党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93]

我们再看看斯大林的这句话，霍查希望这句话能吓跑他的读者，使他们不敢从辩证法的角度批判性地审视这个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铁板一块的政党，不是由不同阶级的人组成的政党。”

上面的引用一方面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又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科学的抽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把它施加到对任何特定政党的分析上，它就是错误和有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必须从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这一科学的抽象上出发（如列宁所说，这更“深刻、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本质）。但共产党内有也肯定有来自“不同阶级的不同部分”的成员。诚然，他们必须在承认无产阶级观点和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入党，但难道在任何一个政党中，知识分子都能不带一丝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路线和组织习惯吗？农民能不把小生产者的某些问题带进党来吗？对党员进行阶级分析（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并用这种阶级分析来帮助理解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和如何去克服它们，难道有错吗？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带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错误，所以毛泽东挖苦道“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94]不存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恩维尔·霍查不是，他尊敬的英雄，上世纪30年代初就宣称自己和少数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是“100%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也不是。

承认党实际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反映社会阶级关系和党自身阶级构成的矛盾，是不是否定了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否定了党只能由一条路线领导的原则呢？这只对形而上学者来讲是个问题，而对马列主义者则不是。

承认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根本上讲是资产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也就是承认其中一条路线是主导路线，也就是说，主导路线，决定了党的性质。也就是认识到这两个方面有可能会发生颠倒，党会蜕化成修正主义。只要党的领导路线，即党的总路线和反应其理论、政策、教导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么把那个党称为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党，称为工人阶级的党就是正确的。这样的政党，要保持马列主义政党的本性，就要同一切不正确路线的表现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认识到这一必要性的同时，也就认识到了在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帮派时，必须同它们作斗争，将他们摧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必须这样进行斗争，粉碎党内有组织的修正主义集团夺取党的控制权和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企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夺高层走资派的权，打垮他们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因此，霍查试图用文化大革命来“证明”毛泽东“允许”资产阶级总部在党内存在是荒谬的。

同时，承认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承认两条路线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要认识到，在党内形成资产阶级反对派，不是偶然的、反常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和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无论哪里有不正确的倾向出现，即使这路线还在娘胎中（由于已经总结过的原因，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迟早会有人站出来支持这些倾向，把它们形成一条完整的、完备的路线，并争取用这条错误路线代替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明白这一点后，党和全党各机关、党员就能不受阻碍地更快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反复）发展，并对它采取坚决的行动。

派性本身就是不正确路线的表现。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分裂性、竞争性和狗咬狗的本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合作。因此，马列主义者必须反对派性，正如毛泽东著名的“三要”和“三不要”所做的那样：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正如中国革命者所指出的（见《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两个“要与不要”是依靠第一个“要与不要”的。
[95] 马列主义者追求团结，不需要搞阴谋诡计；他们的力量在于路线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领导了革命的前进。

因此，越是坚持正确的列宁主义党内生活原则，就对正确的总路线越有利。很显然，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必然会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找到自己的力量，正如他们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公开的政治斗争。因此，这不是“允许”党内派性、阴谋诡计存在的问题，而是认识到反对它的斗争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一部分，提醒广大党员和群众，路线错误的人，不能也不会遵守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因此必须保持警惕。霍查坚持党内是“铁板一块”的，这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拒绝把一分为二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反映。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实际上采用了“德波林学派”的哲学路线。（这一学派是以一位苏联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哲学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特别引人注目，他鼓吹矛盾不一定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而只在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存在。比如，德波林哲学学派认为“第三等级”（Third Estate）——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反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势力——内部没有矛盾，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才出现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在著名的《矛盾论》中他指出：

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96]

因此，霍查在王明曾经师从的哲学学派中寻求庇护所，以此疯狂攻击毛泽东的路线，试图为历史对王明的判决翻案，就不足为奇了。

不考察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怎么解释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胜利呢？要么彻底否定党内矛盾，把修正主义简单说成是外部力量侵入党内，要么（这说法实际是一样的）说，党内矛盾只在特定阶段，由于外部力量，或是革命家的错误等才出现。上面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形而上学。

斯大林在党内否认两条路线的矛盾。他不“允许”它存在。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兴起。苏联的群众对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和必须采取的行动有了更好的理解了没有？当然，在斯大林之前，没有一个成功领导了革命的共产党蜕化变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要让他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发展是有失偏颇的。[\[96a\]](#)但在历史经验为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提供了基础的情况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总结和超越的情况下，霍查仍然坚持把这些错误重复和提高到原则的地步，那又是另一回事。

当机会主义在一战时的第二国际获胜时，列宁运用辩证法的科学，能够追溯使其背叛的矛盾的发展，揭示其社会历史根源。他揭示了社会民主党是怎么分裂成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两派的，这种现象为什么是以帝国主义国家扶植工人贵族为物质基础的，以及长期的和平、合法工作的状态，怎么样在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欧洲工人的党，另一方面也为这些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用市侩的、议会的做法和观点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他揭示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机会主义势力是如何起来的。

霍查无法解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兴起，因为他拒绝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矛盾不是随着赫鲁晓夫政变而出现的，而是那时爆发的。因此，霍查的“伟大贡献”在于否定过去二十年来在反修斗争中取得的真正进展，坚持把每一个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都奉为圭臬，凡是和他不一样的，都定为异端。[\[96b\]](#)

最后，在回答霍查对毛泽东党内路线的攻击时，有必要设法澄清他对毛泽东处理党内斗争的政策所散布的一些谎言。霍查引用毛泽东的话：

……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97]

霍查除了撇开毛泽东对妥协的定义（灵活性），还抹去了毛泽东的结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98]

首先要指出的，毛泽东具体讲的不是党内的顽固反革命分子，不是资产阶级头目。他在霍查引用的那一段之前明确说：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99]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霍查他出色的辩论风格。他实际上做成了两件事：第一，他强迫任何严肃的读者去查找原始材料，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从霍查的“引用”中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话；第二，他亲自让他的观点彻底破产，他自己甚至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经不起与毛泽东思想的正面对抗）

很明显，毛泽东并不是在鼓吹与顽固分子无原则的团结。在考察他的演讲背景后——1957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正确的观点就更有意义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异常复杂的捍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一方面是同赫鲁晓夫在战术上的妥协，另一方面是努力争取在场的60多个共产党并尽可能和他们寻找共同点。毛泽东的观点是清楚的，即使他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

霍查还指责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建议“选举左右派各方领导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100]霍查选择不透露这些领导人的姓名，这会在他的观点中又添一个漏洞——因为这些领导人中就有我们的老朋友王明——“100%的布尔什维克”，霍查正是追随了他的路线。此外，

霍查在解释列宁和斯大林为什么也曾同意选举机会主义领导人到中央委员会时也会遇到一些磕绊。首先，努力挽救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正确的；其次，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罢免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并不一定是可能的，这种做法也不一定明智。比如，这些领导人可能并没有被揭露，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这个社会基础需要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特定斗争后才会被削弱。在许多阵线上，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对“左倾”和右倾展开的斗争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某个修正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那在两条或多条战线上发动的进攻可能会失败。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常常需要同时在几个战线上进行斗争，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起，也有许多情况是，革命者必须集中精力进行一场内部斗争，否则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我们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认为 1956 年选王明、李立三为中央委员是可取的，但很明显，这样的行为不能说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原则，直到 1927 年最后的倒台，托洛茨基还多次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难道霍查真的认为列宁和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本质吗？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他主张重新选举李立三和王明为中央委员。当然，他们是历史上对党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的两大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对他们现在的路线不抱幻想，特别是王明，他还想走回他曾做过自我批评的错误的老路上。实际上，毛泽东说：“……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 [101]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他接着谈到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

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102]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两个人在一九四五年当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存在，并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损失：“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说的是1949年的胜利]” [103]毛泽东接着解释说：

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104]

这就是霍查想说的。毛泽东公开地、无耻地接纳已经证明是机会主义者的人进入无产阶级政党！这里详细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不仅是为了反对霍查对毛泽东言论的错误引用和歪曲，而且因为这个特殊的例子也可能引起其他真正革命者的质疑。但毛泽东的想法又有什么问题呢？它是以什么方式违背马列主义的原则，与革命背道而驰的？一点也没有。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到中央来，不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是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下，推动革命前进。

他们很出名，他们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造成太大伤害。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当时的）反革命分子和分裂分子，而是非常公开地犯思想错误的人，特别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容易犯的那种动摇的错误。因此，他们是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象征，总的来说，无产阶级要想在中国革命中取得成功，总的来说就必须团结他们，对他们进行非对抗性的斗争，取得领导权。（这一必要性要把握好，要知道中国亿万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把这两个人留在中央，对革命是没有坏处的。（实际上也很难证明他们的存在造成了任何损害）打倒他们却会造成一些坏影响，使他们的社会基础感到不安和恐慌，而当时共产党正试图团结和争取这个社会基础。

但是，也许还有人会问，即使中国共产党要争取这个社会基础，为什么要把小资产阶级代表放在无产阶级的党中央？这个组织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吗？这难道不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由不同阶级的人组成的政党”吗？（按照霍查引用斯大林的话）

这些问题有几个答案。首先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人在党内，甚至在党中央内，并不能使党成为不同阶级成分组成的集团，也就是说，这不一定改变了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走无产阶级路线的基本性质。任何客观的旁观者都必须承认，王明和李立三的路线被揭露且失败后，他们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在那一时期内的基本性质和路线。

其次，要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领导和赢得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05\]](#)鉴于这个事实，人们加入领

导这场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党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入党者在当时确实是革命的，甚至自称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他们没能真正吸收马列主义，这些人实际上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去自欺事实不是这样，不是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就是想逃避现实。考虑到这是一种必然，承认事实并解决它（就像毛泽东所做的那样），而不是假装事实不存在，只谈论党整体的纯洁，岂不是好得多，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第三，即使一场革命没有面对中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假装革命党的绝对纯洁——即使在全国取得政权后——也只是自欺欺人。列宁很清楚这一点：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106]

第四，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钻进无产阶级政党？他们不能被赶走和消灭？但我们要记住，在这里讲话的是开明的列宁，而不是像恩维尔·霍查那样的无产阶级纯洁铸铁。

第五，当然，这样的妥协最好不要做。但除了高高在上的霍查先

生的革命以外，革命正是在许多这种战术妥协中进行的，甚至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也是如此。霍查对 1917 年 8 月托洛茨基当选布尔什维克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有何看法呢？列宁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他是“纯粹的”无产者吗？不正是要在这种情况下，妥协着团结他，特别还让他成为一个领导人物，以赢得他的社会基础——在观点和阶级组成上都很大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吗？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多不是和托洛茨基一起被允许入党的吗？[106a]

最后有一段被霍查认为是异端的文字中毛泽东同样谈到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

霍查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他对此很震惊。他纯洁的认知被玷污了。好吧，我们能说什么呢？缺乏幽默感似乎成了“马列主义[原文如此]文化”了，霍查认为毛泽东背离了“马列主义文化”。[106b]

我们可以更近一点地观察霍查的家乡。阿尔巴尼亚革命首先经历了官方所说的“反帝民主革命”阶段，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秩序”。[107]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没有完全吸收马列主义——客观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入党了？我们不必只是猜。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现由 1976 年通过的新宪法取代）提及该党：

更加积极、自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加入党的队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是所有劳动群众组织、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108]

这是否意味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是“只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呢？这点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官方党史上，谈到1948年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有更多的解释：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PLA）。这种变化由国家和党的社会构成决定，并没有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在阿尔巴尼亚，大部分人口（约80%）是农民。这一点也反映在党身上，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土地上的劳动者。[109]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还至少没有把他们的党改名为“中国工农党”或“中国劳动党”！

诚然，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在一定条件下，它的绝大多数党员不是不能来自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关键是，霍查认为一个政党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社会构成”。（所以，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党，就必须是工农党，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阿劳动党从来就没有就这一点批评过它自己，还继续保持“劳动党”的名义。然后，当毛泽东处理执政的共产党中的出现小资产阶级代表的问题时，霍查就在天上狂吠，这就是他的虚伪和完全无原则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辩方法的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

在霍查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指控中，最愚蠢的或许是他将自己对党内斗争的官僚作风和形而上学态度与对党内民主形式的虚伪诉求结合起来。他说，中国领导人行事“搞阴谋诡计”，“许多了解党和国家活动所必需的文件都没有公开。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非

常谨慎地出版自己的文件。” [110][110a]

如果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彻底了解哪个政党的路线，那条路线是怎么在同其他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条路线在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是如何体现的，那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110b]有人会向提醒霍查，“在玻璃房子里住着就别扔石头。”事实上，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路线斗争，特别是劳动党领导层与在该党中形成并被击败的各反对团体之间的实际斗争情况，根本不可能搞清楚。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所有的文件都在说，这个或那个“外国间谍”、“叛徒”等等试图颠覆党。至于对立路线的政治内容是什么——除了最简单和最肤浅的描述之外——谁都得靠猜测推断。如果霍查想说劳动党内没有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再说一遍，我们不相信，也没有人会真的相信，甚至连你的狗腿子们都不相信。

我们详细讨论了霍查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性质的路线的批评，他领导的宣传队伍正在吹嘘他的著作是普遍适用的。事实上他的著作是普遍错误的。他关于“党整体纯洁”的论断，对于正在夺权和已经夺权的党来说一样错误。值得指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他所提倡的机械思维在用于正在夺权的革命党时是错的，用于试图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时更是错上加错。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夺权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经济基础完成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阶级斗争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霍查自己的话说，党内的阶级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112]但霍查没有区分资本主义下和社会主义下的斗争。他说：“党不是阶级之间对抗的竞技场。” [113]真的吗？那霍查是怎么认为赫鲁晓夫的政变的呢？他怎么看待斯大林死后两年内苏共高层的激烈斗争？这不是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没有发生在共产党党内吗？或者说，他怎么看待斯大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持续数年的斗争？

实际上，霍查对这点的分析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像华国锋和邓小平。华国锋集团一上台，就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右派”的教导进行了猛烈的理论攻击。华国锋用一种跟霍查极为相似的手法，论证了党的阶级斗争只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虽然口口声声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著名语录，但他批判“四人帮”（大家都知道是毛泽东领导四人帮）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于党内的观点。^[114]根据华国锋和霍查的观点，如果党内有资产阶级，那么党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华国锋和邓小平走这条路线的动机非常透明。他们想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整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目——正是他们这样的走资派——身上引开。

在此值得引用一段当中国共产党还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领导下，党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候的论述：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着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表现得越来越深刻和尖锐。^[115]

在上面引述的文章和许多其他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唯物主义的 analysis，特别是对主要矛盾的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霍查否认这一矛盾，主张社会主义“消灭了对立阶级和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116]（显然，被消灭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新宪法“不允许”它存在！）

上面引述的中共方面的文章指出：

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性。……

从经济上讲，走资派之所以是党内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

义时期，无产阶级要不断地改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协调的上层建筑和与生产力不相协调的生产关系，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党内的走资派千方百计地维护上层建筑的这些部分，维护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只是徒劳的尝试。[117]

大约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这点提出了更多看法：

如果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权在大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手里，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变成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资本增值运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社会主义所有制沦为“外壳”，实际上是走资派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事实上已经丢掉了生产资料。

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看社会主义制度，它不基于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基于平等的同志式的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但归根结底，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依然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工资标准的差别]依然存在，在这些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是今天必须被消除的人与人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如僵化的等级制度、脱离群众的特权、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往往会在它们被消灭后重新出现。如果某些部门的领导权被走资派篡夺，他们会加强和扩大人民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使工人重受“管、卡、压”，使社会主义的人民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情况在今日的苏联尤为明显。[118]

文章接着说：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一点也不奇怪。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这种矛盾就必然反映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怕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存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用“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谬论欺骗自己和他人，邓小平听到“走资派”这个词，和阿Q听别人说他头上的疥疮一样害怕。这是因为他们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这对他们来说既痛苦又不可思议。无产阶级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敢于承认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存在，而且敢于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反对走资派的坚决斗争中，通过宣传、张贴大字报、举行群众辩论等方式去发动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终使资产阶级走向坟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目的是埋葬自人类存在以来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泽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把这个重要问题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19]

上面的引文，简洁明了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性质的路线。正是这条路线，现在在中国被推翻了，也被霍查攻击着。

当然，苏修分子也一直在疯狂攻击这条路线。苏联、阿尔巴尼亚、华邓集团三条路线联合起来攻击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否定了辩证法。三者都没有从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或者是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都拒绝——无论是像阿尔巴尼亚人或苏联人那样公开拒绝，还是像当今中国统治者那样不公开但本质还是拒绝——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对立阶级。

让我们来看看霍查关于社会主义下没有对立阶级的观点，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只剩下一些“残余”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斯大林首先阐述了这一论断，他宣称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苏联被消灭了。这一提法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错误，也揭示其思想基础——形而上学的倾向——这搅乱了他的思想。但斯大林真正的继承人，苏联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却因此得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资产阶级不仅存在，还成功地卷土重来，夺取了国家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对于霍查试图复活的这条被历史否定的路线，人们只能回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

不幸的是，这闹剧不是闹着玩的。国际无产阶级又一次遭受惨痛的挫折，即中国革命暂时失败，大批马列主义者和革命志士迷失了方向。霍查给了他们一碗迷汤，一碗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迷汤——中国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因为毛泽东“允许”了资产阶级的存在，所以那里的失败就等于没有失败。但在那里仍有希望——如果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夺取了政权，竞赛仍然能够获胜——稳步地、“不间断地”推进，无产阶级将不必经历混乱、激烈的斗争和失败，就能到达永远和谐稳定的彼岸。好吧，霍查牧师，你的神话并不好听。工人阶级和人民已经听够了童话般的谎言了，并不对另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人感兴趣。工人们不想要这样的担保——很快他们就会认识到只有傻瓜和机会主义者才能让他们抓住胜利而从不失败，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所需要

的是科学，一种解释社会运作的科学，它将使他们能够根据这个规律改变世界。

让我们暂时回到苏联问题上，在赫鲁晓夫中断“不间断地”前进之前的几年，如果没有敌对阶级，没有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从哪里来？他们是地主和前资本家的儿子，还是从帝国主义国家偷渡到苏联的“外国特工”？赫鲁晓夫和他的一帮人就站在红旗下，他们是共产党的高官，就像霍查所引用的马列主义一样“纯洁”。

但他们确实是资产阶级。不是依靠手中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健全的资产阶级，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出的。[\[119a\]](#)他们在仍然存在的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残余中成长起来——这些残余是不可避免的，并在这些残余中茁壮成长，这些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不是因为斯大林“允许”它们存在（他直到死前才察觉，而且只是部分察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印记”，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不能被一蹴而就或空想地消除。只有随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这个基础上再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挖出来。

苏联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同他们在中国的堂兄弟一样，在旧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上雨后春笋般出现，进而为维护和扩大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而活动。即使无产阶级控制党和国家，修正主义者被批判的同时，党内的走资派也能够篡夺各单位、各部门、各工厂的领导，以及党的关键部门，文化、教育、科学等社会机构的领导。这不可否认。

霍查认为在修正主义者夺取全国政权之前，这些被他们控制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什么关系呢？他真相信赫鲁晓夫手下的工厂里，没有剥削发生，没有官僚私自侵吞工人集体劳动成果这种事存在吗？他真相信这些工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完全是公有的吗？修正主义者只有在成功篡夺政权后才能全面、系统地施行他们的政策，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不，修正主义者不是犯有错误的没有阶级意识官僚，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吸吮工人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他们试图在他们控制的每一个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自己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的据点，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列主义，为自己决心走的道路准备舆论。在党这个阶级斗争的角斗场，他们提倡修正主义，要求采取反映自己剥削阶级发展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尽全力消灭马列主义路线。

从苏联修正主义胜利的实际历史来看，这一切都显得十分明显。这跟霍查的想法不同。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修正主义夺取政权以后才产生的。德波林学派又一次抬起了他们丑陋的头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只会凭空出现。在这个革命者不“允许”资产阶级、敌对阶级或党内错误路线存在的国家，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霍查不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他不能深入事物的表面，理解它的矛盾本质。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即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工人阶级生产社会化的私人占有，而只看到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些形式和影响，如股份公司、利息支付、一些人高高在上和不做任何体力劳动等。正因为这样，不管允不允许，他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在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如何存在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充满矛盾。一方面，主要地说，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向旧社会的一切残余发起进攻。但客观上，党也是社会主义的行政机关。对特定单位行使领导权的^人大多数是党员，国家的计划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等等。党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同时党本身的存在也与党的奋斗目标相矛盾，即消除一切阶级差别，随之消除一切对国家和政党的需要。党试图消除一切不平等，但却发现自己必须保护、甚至强制执行以工资差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

工等形式存在的不平等，因为党不能简单地消灭它们。所有这些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的矛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向相反的政党的转变成为可能。

毛泽东有重要陈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很好地针对恩维尔·霍查。当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就栖身在党内的时候，霍查却让工人们去寻找那些早就被剥夺了的旧剥削者。霍查会让马列主义者集中精力揭露小剥削者非法雇佣劳工等事件，而不是集中力量揭露和打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的领导变为空壳一具，企图把工人又一次拉回到工资奴隶的地位的掌权者和大人物。霍查不象毛泽东那样，指挥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是可能指挥去反对像孙中山遗孀那样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一个政府机构中占据了一个正式的职位，尽管这个职位多年来从来就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实权。当然，这些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次要来源在中国政变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在苏联也是一样，但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目前看来，他们只有在党内资产阶级指挥和领导的情况下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旧资产阶级（即旧剥削阶级的特定成员）实际上是不可能复出的，毕竟，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了，不断受到政治打压，变老或死去，政治上名誉扫地，社会上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许多子女也被争取来支持，接受社会主义了）。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沙皇的老亲信，富农们，前工厂主们，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就永远无法夺回政权。但他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就不可能恢复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外敌的入侵。从本质上讲，这条路线就是霍查重提的路线，他自己也有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对立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废话”，阿尔巴尼亚党从毛

泽东那里拿到语录，却从来没有吸收他的马列主义路线，反倒攻击这一路线是修正主义。

斯大林对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认识，与他关于资产阶级消亡、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对立阶级和对抗性矛盾的理论，有着深刻的矛盾。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去世前不久所写）中开始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纠正了上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矛盾的观点，但他对当时苏联阶级斗争的性质仍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苏联路线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不存在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应交给赫鲁晓夫来“解决”。赫鲁晓夫用他臭名昭著的“全民国家”理论做到了这一点。

毕竟，赫鲁晓夫认为（不无道理的），如果不存在资产阶级，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为什么必须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维持一个按照其定义存在的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武力镇压的国家呢？再者，如果国家不再需要打击内部产生的敌人，只需要对付外部的帝国主义敌人、敌特和阴谋家，它的存在只依赖于这个外部的敌人，这个国家还有比称呼为“全民国家”——实际上代表了苏联社会现存的所有阶级（工人、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履行着抵御外敌的职能，更适合不过的选择吗？当然，斯大林的理论混乱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要好得多，但必须说，赫鲁晓夫在建构修正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斯大林的理论混乱并不只是少数。

四、辩证法

本文中，我们试图证明霍查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但是没有必要从他的政治观点中去推断。在对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中，他相当直接而坦率地承认了。

霍查首先对毛泽东提出了荒谬的指控，即“他（毛泽东）坚持一个形而上学的、演进的概念。”但是，在试图“解释”毛泽东的概念时，霍查露出他自己完全形而上学学的世界观：

与唯物辩证法设想的螺旋式渐进发展相反，毛泽东主张的发展是一种循环的发展，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回到平衡，是从运动到静止再到运动，是由升到降、由降到升，由进到退，再由退到进。[120]

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坚持过形而上学的演化概念。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中，他直接表达了反对，“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他指出：“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121]

在这段话中，甚至在整个著作中，毛泽东都对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彻底而深刻的剖析，对于任何读过它的人来说，霍查对它的表述显然就是诋毁。但是有趣的是霍查对“周期”的定义以及他如何试图将其与螺旋上升的概念做比较。

事物不会在一个“循环”中重演，这当然是事实，正如事情确实会从低谷到高潮，再从高潮到低谷，从前进到失败再到前进等等。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式吗？每个“循环”，如你所见，都不会回到起点，实际上，从总体上讲，每个周期都蕴含着运动的整体进步。在战争中，军队从前进到撤退再到前进，不同样是如此吗？正是通过这一周期性过程，战争的总体方向，进展才得以实现。对于任何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通常都是这样。只有在阿尔巴尼亚（实际上只有在霍查的思想里）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受干扰”地进行的，从来不会经历失败和挫折，那些动荡和“混乱”的时期更是闻所未闻了。

霍查在焚烧毛泽东的书时，他应该同时烧掉马克思的《资本论》

（马列主义者始终坚持把它作为辩证法应用的经典例子），《资本论》上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表示事物不是在无穷的，不变的重复中发展的，事物发展前进是通过循环来实现的。例如，资本的增殖，其公式为 $M-C-M$ ，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马克思将其描述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或“资本的循环过程”。他说：“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122]但是，这“无休止”的循环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从竞争性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移的过程。又比如，危机在资本主义中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但就是在这种周期性循环的危机中资本主义走向它的终结。关键是，尽管这些过程是周期性地进行的，但这些循环并不是无休止地回到其起点的，而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循环，事物才有了新的发展，才有质变的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彩总结是正确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123]

可见，毛泽东明显是在提出事物通过一系列无休止的循环（螺旋前进）上升到“更高阶段”。霍查混淆了这一点，因为他能理解的唯一一种“螺旋”是没有任何曲线的螺旋。任何一个认为螺旋不包含周期的人在字面上和政治上都肯定是个瞎子。 [123a]

尽管霍查试图把毛描绘成一个占星师和一个相信古代神话的人，他却缺乏相应的证据，我们将继续研究他反对毛泽东的另一个更为严肃的论点。在他的充斥着典型的霍查式谬论和糊涂思想的著作中，霍

查说：

毛泽东否定事物和现象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把发展看作简单的重复，看作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事物和现象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系。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被理解为只是位置的交换，而不是矛盾的解决——构成这些对立面的现象的质的变化，这被毛泽东当作万物都服从的规律。[125]

好一通高谈阔论！否认党内有两条路线，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对立阶级存在的霍查，却在这里居高临下指责毛泽东否定事物的内部矛盾。这一指控几乎和他那聪明绝顶的论断：“毛泽东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没有两样，而随后他又以一个又一个事实证明自己才是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榜样，这番论述简直就像高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贼一样！

但撇开这一荒谬的指控和霍查要将他重新发明的“循环理论”钉在毛泽东身上的企图，我们来到了问题的核心——霍查认为“对立面相互的转化”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和构成这些对立面的现象的质的变化”。好吧，霍查对了一半，这比他的大部分观点都有很大的进步。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确实意味着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不幸的是，在霍查的辩驳中，除了用空洞的断言，他没法指出毛泽东哪里否认了这一点。毛泽东不仅没有否认，他还跟霍查不一样地正确地解释道：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

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26]

毛泽东非常清楚，矛盾的对立转化，并不像霍查以为毛泽东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位置的交换”，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不，这里的区别——这至关重要——并不是当对立面彼此转化时是否发生质变，而是在于这种冲突是否“解决”，或者说，“消除了矛盾本身！霍查的观点与他先前所犯的“德波林学派”错误形成了反面。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霍查的路线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矛盾仅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出现，矛盾在质变时消失。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看不到从事物的出现到消亡，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

霍查认为当矛盾的两方面都转化为了其对立面时，矛盾就被解决了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例如，在世界范围内或在任何特定国家中，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甚至在阶级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有到和平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直到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完全“吞并”了它的对立面战争时，这个矛盾才得以解决。到那时，战争与和平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矛盾，和平这个词本身将不再具有除了历史意义外的任何意义。

但是，从战争出现到共产主义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方面始终处于斗争之中，发生了许多次质的变化，其中包括战争变成了和平，和平发展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批评苏联哲学教科书（他说这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说战争与和平之间没有任何同一性是正确的。[127]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相对和平时期发

展起来的，而相对和平时期是从相对战争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都没有得到解决。每个和平都蕴含着战争的潜在条件（既包括过去的战争也包括即将发生的战争以及革命战争）。而且，这一过程并未像无休止的循环那样重复发生，而恰恰是螺旋状的，从战争到和平再回到战争的每个循环都使社会向前发展，随着革命战争——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战争。只有革命战争才能消灭战争——首先在一个国家，然后在几个国家胜利。正是这种正确、辩证的认识，使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敢放言，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就要灭亡，下一场世界大战将导致一场空前规模的革命风暴，真正有可能使帝国主义制度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

当然，自然界和社会也有许多其他例子说明了这一规律的运作方式，在这些例子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并导致质变，但矛盾仍然存在，对立面之间继续斗争。霍查的观点反映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认为一旦质变发生，矛盾的各个方面就不可能再发生逆转，因为矛盾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是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逻辑，反辩证法的霍查哲学。就常识而言，他可能做得很好了，但这只会导致一场革命的失败。

霍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想发明一种不存在的哲学原理（质变意味着消除产生它的矛盾）——以证明他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正确。因此，霍查批评毛泽东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消灭对立阶级和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的质变，而是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地位转化。” [128]然后，他引述毛泽东的话：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

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129]

霍查评论道：“同样的逻辑使毛泽东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

好吧，霍查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正是毛泽东这样的逻辑、即从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来处理问题的辩证逻辑，引导他发展了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毛泽东让霍查大发雷霆的论述是这么说的：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130]

霍查可能不喜欢毛泽东的理论，但我们认为它很正确！

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与共产主义不同，这不是很显然的吗？霍查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类型的两个阶段，一个社会经济秩序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的发展和成熟程度；毛泽东却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截然相反的。”[131]这就是霍查修正主义路线的“伟大”所在。把社会主义分为矛盾的两面进行分析是不被允许的，承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不被允许的。

毫不奇怪，正是霍查因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矛盾，才使他无法理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从霍查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这种转变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基本达成，尽管处于共产主义“较低的”阶段，要实现全面的共产主义，只需要量的积累，

“不间断的发展”直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反过来又反映了“新生的共产主义”（列宁的说法）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留下的印记（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之间的矛盾。当这些矛盾得到解决，即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印记在无产阶级的再三打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下消亡时，那么，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说人类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王国，那时，新的矛盾将决定社会特征。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是一个质的飞跃，而阶级的彻底消灭是另一个更深刻的质的飞跃。这是很基础的理论，特别是考虑到巴黎公社一百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这些经验证明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时间，资产阶级的反抗，旧社会的胎记，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要激烈得多，顽固得多。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在他们的历史年代是光辉灿烂的，但由于无产阶级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存在着局限性。但霍查坚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是同一个“社会经济秩序”的认识是多么地荒谬啊！

好吧，霍查先生，“按劳分配”是否反映了与“按需分配”相同的社会经济秩序？一个由阶级专政政权维持着国家的社会和一个没有国家、阶级消亡的社会，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一样的吗？真的，即使是个孩子也能看穿霍查的愚蠢。经过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呢？

然而，霍查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上相同的理论带来的影响早已有了恶果。那就是他们大门敞开欢迎的“唯生产力论”——一条和修正主义结伴随行的有害路线。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成熟”的程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在社会主义被消灭了，这就可以推出，区别共产主义和它“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区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事实上，“唯生产力论”就

是霍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部活动的逻辑产物和恰当伴侣。

在中国，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惨痛的损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地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马列主义者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是坚持坚持革命信念，在马列主义的科学和毛泽东对这门科学发展与丰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革命斗争。还是注定要抛弃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抛弃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某种形式去与修正主义相妥协？

中国的革命事业失败后，马列主义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阿尔巴尼亚和恩维尔·霍查身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一道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做了斗争，支持过文化大革命，为全世界树立了拒绝向修正主义投降的榜样。但现在，那些我们必须珍惜和捍卫的东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激烈斗争，在挫折中取得的成果，在被期待着事情发生转机的地方遭到了进攻。

显然，跟霍查郑重声明的恰恰相反，阿尔巴尼亚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现在的修正主义统治者对毛泽东异口同声地攻击没有根本区别。他们都反对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代表了所有让他们充满恐惧的东西，尤其是，冲垮了一切阻碍共产主义前途的东西群众革命洪流和敢于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按无产阶级的愿望去塑造的勇气。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以及现在的恩维尔·霍查，都对毛泽东的辩证法感到恐惧——他们害怕毛泽东精心和不懈地努力寻找每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害怕他拒绝向修正主义的淫威投降、害怕他认识到世界会在动荡和斗争中向前发展，害怕他愿意带领群众在不可避免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鼓舞了各大洲的革命者，使所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心惊胆战。

霍查对毛泽东“亚洲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指控直接来自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诽谤；[131a]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的厌恶和对被错误对待的“共产党人”的同情让人直接想到了邓小平。他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成为马列主义“纯洁性”的代表，但他的思想只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奇怪变种，还显示出不断失去其独特性，与来自莫斯科的主要的修正主义思潮融合的迹象。唯一重要的是，他企图把以前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者拖进修正主义的泥潭，企图把背叛和投降的苦果变成糖衣炮弹。他不应该陶醉于他能作为斯大林——一个没有革命精神的斯大林——去主导世界运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已经抛弃了他。另一些则稳步右转，几乎跟一些修正主义政党无异。还有一些是可悲的小宗派，连革命的念头都没有。

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了霍查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后，经过深入地观察霍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后，我们做出站在革命立场上的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十字路口之际，恩维尔·霍查有机会也有责任去扮演一个巨人的角色，但他最终选择做一个懦夫。” [132]

译者注：

*涅瓦大街，或称涅瓦大道，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其中一条主要道路。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指 1979 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注释：

[1]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芝加哥 1979 年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 113 页。

[2]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5] 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5a] 在斯大林关于中国的著作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观点。例如，共产国际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全体会议（1927年5月）是这样说的：

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和国有化土地——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内部基本的社会经济内容……共产党应当冲在这场运动的前面并领导它。

[6]

还有，1930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点。革命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形式发展起来。[7]

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和建议总是正确的。

[6] 《共产国际 1919-43 年文件》第二卷，简·德格拉斯（Jane Degras）编辑

[7] 《共产国际 1919-43 年文件》第二卷，简·德格拉斯（Jane Degras）编辑

[8]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9]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9a] 无论是阿尔巴尼亚翻译人员故意引用阿尔巴尼亚版的毛泽东著作来阻止读者对霍查的“改正”工作与（毛泽东的）原著进行对比，还是对这一重要问题采取了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都将让

读者自行定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几乎不可能参考原著，特别是《毛泽东选集》里的内容没有被引用之时。

[10]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1a]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霍查很清楚他投给毛泽东的是诽谤。很明显，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具有两个阶段的性质。劳动党在它的党史里似乎理解得很好——阿尔巴尼亚革命最初是“反帝民主主义革命”，后来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书里这样解释道：“革命的第一阶段，党的战略目标是确保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民主的秩序。”

[12] 后来，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劳动党路线被解释如下：

“在新的条件下，党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口号。除了积极参与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广大人民群众之外，这个（团结的）联盟还应当包括那些被反动派所欺骗的人，那些曾经孤立无援，但现在可以为我们的新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的人。”

[13] 这无疑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事实上，这是劳动党（当时称的）采取的正确路线。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尽管劳动党本身承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右倾错误）；[14] 重点在于，霍查在一场有明确民主革命特征的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当时的霍查和党认为这一阶段是夺取政权后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阶段，但然后霍查就转过身来，指责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是某个异端邪说——这更像是蓄意的诡计，而不仅仅是霍查个人的（理论）混乱。

[12] [13] [1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史》

[15]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16] 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1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8]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19]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20] 参见《革命战争和军事路线》第二部分, 这系列书籍讲述了毛泽东在革命中的不朽贡献, 1978年6月版。这一系列现在作为一本书再版, 由美国革命共产党(RCP)出版社出版(芝加哥, 1979年)

[21] 斯大林,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22] 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23]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24] 毛泽东,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25] 毛泽东, 《学习与时局》

[26] 毛泽东, 《学习与时局》

[27]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28] 韩素音, 《早晨的洪流: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一八九三~一九五四》

[29] 韩素音, 《早晨的洪流: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一八九三~一九五四》

[30] 斯大林,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31] 斯大林, 《时事问题简评》

[32]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33]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34]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35] 恩维尔·霍查, 《帝国主义与革命》

[36]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37]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38]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9]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4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41] 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

[42] 恩维尔·霍查，《霍查选集》

[43] 恩维尔·霍查，《霍查选集》

[44] 恩维尔·霍查，《霍查选集》

[45] 恩维尔·霍查，《霍查选集》

[46] 恩维尔·霍查，《霍查选集》

[47] 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 15 岁了》

[48] 恩维尔·霍查，《始终遵循正确路线》（霍查在 1960 年 6 月 22 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阿尔巴尼亚挑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做的贡献，霍查全集第 19 卷）

*斯大林反对在当时马上进行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战争，认为中共无法战胜蒋介石军队，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共保持自身独立性、保持革命根据地和军队的独立存在。该注释是译者加的。

[49]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50]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5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5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5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5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55]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56]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57] 毛泽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58]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59] 见《红色文件 7》，《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这对全世界斗争有什么意义？》

[60]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6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2]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63]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6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5]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拉那，1977年，第 13 页第 16 条

[66]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67]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68]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6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7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72]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7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史》

[74]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75]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76]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77]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78]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79]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79a] 《五四运动》这篇文章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都是在 1939 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发表的。

[80] 毛泽东，《五四运动》

[81]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82] 毛泽东，《五四运动》

[83]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 年 5 月 1 日

[84]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和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85]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86] 王明，《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

[87] 见英国《卫报》（1978年10月29日），第13页，引述越共党报《人民报》总编辑黄东的话。

[88]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89]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90] 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78年），其中阿劳动党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国家政权告终”

[90a] 读者可能会问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为什么霍查会在斯大林死后修正主义迅速复辟的时候，不加批判地支持他呢？事实上，这是阿尔巴尼亚路线上的矛盾之处，他们躲开它像躲避瘟疫一样。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胜利作出任何真正解释的肤浅和无力。

[91]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91a] 同时，毛泽东出于战术上的原因，有时看到且主张把一些机会主义者放在党内某些位置。下面会讨论这点。

[92]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93]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94]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95]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96] 毛泽东，《矛盾论》

[96a] 南斯拉夫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社会主义是否在南斯拉夫建立过，以及南联盟是否曾是马列主义的都十分值得怀疑。

[96b] 虽然这篇文章不是对霍查政治路线进行全面批判的，但值得指出霍查决心将一些错误奉为圭臬。对季米特洛夫路线和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观点完全不加批判的赞同；斯大林在 50 年代初提出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丢弃了民族旗帜”，工人阶级有义务举起民族旗帜并为之斗争——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也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认识到并考虑到革命风暴中心从西方向东方（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转移的事实。这些都是霍查继续坚持并捍卫错误观点用来攻击马列主义发展的例子。

[97]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方括号里的话没有被霍查引用，尽管它是句子的一部分，可以查阅毛泽东的《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98]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99]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100]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01]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102]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103]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104]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10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0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06a] 托洛茨基有布尔什维克们想用来领导革命的组织技巧，他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正式（声称）断绝了他过去的错误（王明和李立三也同样）。

[106b] 上面的引用来自毛泽东的《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霍查（在《帝国主义与革命》中）抱怨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全是典型的中国刻板公式，让阿尔巴尼亚理论家很难理解。……”

因为我们习惯了按照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和文化来思考、行动和写作。”

[107]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史》

[108] 威廉·阿什 (William·Ash) 《鹤嘴锄和步枪：阿尔巴尼亚人的故事》

[109]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史》

[110]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10a] 在同一节中，霍查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观点，即毛泽东的四卷选集“是精心安排的，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出发展的实际情况”，但却不敢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霍查不想继续讨论这一观点的原因是，消息来源只是苏联媒体。例子是《毛泽东的哲学观》[111] 这篇文章里还有霍查对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诽谤，如“种族主义”等等。另外，霍查还高呼霍查也大声疾呼“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定期召开”，把形式置于内容上，让人想起资产阶级议员而不是共产党员。（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会问霍查——这个强有力的、毫不妥协地维护党的代表大会原则的人，为什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直到 1948 年——党成立 7 年后，全国解放 3 年多后——才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110b] 初期的社会主义苏联也是如此，但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要从出版印刷的文件中全面了解苏联的路线斗争就变得困难得多。

阿尔泰斯蒂，乔治耶夫，《批判：毛泽东的哲学观》（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Mao Tsetung: A Critical Analysis）

[112]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13]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14] 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115] 方康，《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北京评论》1976年第25期

[116]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17] 方康，《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

[118] 庄岚，《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本文最早出现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该杂志在四人的直接领导下于上海出版，在1976年政变后被镇压。

[119] 庄岚，《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119a] 正如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一词也有不同的含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不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生产资料的阶级”，他们不再受资本支配。但从中得出，共产党人不能再讨论社会主义下的无产阶级，这就荒谬到极点，而且是修正主义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存在，但都具有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点。很容易看出，教条主义的方法（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来分析那些定义不严格适用的情况）与修正主义结论（没有对立阶级）能很好吻合。

[120]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21] 毛泽东，《矛盾论》

[1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卷

[123] 毛泽东，《实践论》

[123a] 我们建议霍查去批判列宁，列宁在他的著作《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五页的文章，霍查引用了但显然没有读过）中写道：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124]

[124]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125]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26] 毛泽东，《矛盾论》

[127]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28]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29]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30]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31] 恩维尔·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

[131a] 请看下面的这句话：“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观点和战术方法，反映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理论和概念——中国封建哲学（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大杂烩。”这是霍查还是他的狗腿子说的？不是的，这句话来自莫斯科 1972 年出版的《北京的沉默》。

[132] 美国革命共产党，《革命》